

# 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

---

【编者按】今年是金田起义 170 周年。70 年前,1951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刊发胡绳同志执笔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肯定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及其体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次年开工、1958 年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范文澜先生则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郑重指出,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些具有标志性的表述和事例,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然而,近三十年来,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及湘军的声音增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本刊约请六位学者围绕“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撰文,希望能对相关问题有所澄清,对深化思考、推进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

## 晚清危局及其出路 ——洪秀全、曾国藩的认知与抉择

崔之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一、朝廷及精英阶层对晚清危局之认知

乾隆后期伊始,清朝由盛转衰,及至嘉道年间,出现内外交困的危局。期间,嘉庆朝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和道光朝的鸦片战争,集中暴露了清廷在内外战争中的腐朽、虚弱和低能,说明清朝国家机器已经不堪应对重大和突发性危机。对此危局,朝廷及朝野士大夫出现了不同认知,而且随着危机深化和焦点转移,精英阶层也发生新的分化,其认知和应对方略因此显示不同的时代特征。

其实,身居权力顶层的皇帝及朝廷中枢对危局并非麻木愚钝。他们承担治国理政大任,基本知悉和掌握涉及国内外情势的重要资讯,更需要应对和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类常规或突发事件,因此能体验和感受到吏治、财政、灾荒、军事、民变、海陆边疆等领域存在诸多隐患、风险和危机,进而察觉和意识到国势的衰变。从大量上谕、奏疏中,我们不难发现多领域爆发危机的案例。就大案而言,嘉庆帝即位初期,就亲自处理白莲教起义和与珅巨贪案,曾下罪己诏,深刻反省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sup>①</sup>他意识到朝廷正面临会党武装反清的空前危局,却仅将原因归结为积重难返的吏治大弊。道光帝沉痛反省鸦片战争惨败,严旨追究和惩处失事官员,但仅仅将战败原因归结为前线文武贪生怕死、欺瞒朝廷。晚年,在查处 925 万多两户部库银亏短案后,他又连续下诏各省清仓查库,结果无

---

① 曹振鏞等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274,嘉庆十八年癸酉九月庚辰,中华书局 2008 年版,总第 15553 页。

不亏短。因此,道光帝对国势衰微的危局具有比其父更加深切的体会。但他们都认定危局根源是官风败坏、官员犯罪,并非朝廷体制弊病,更非皇帝错咎。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惩处犯罪官吏,澄清吏治,严守祖宗法度,就会复归太平盛世。鸦片战争以后,道光帝渴盼天下太平,中枢遂配合粉饰,“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sup>①</sup>这种上下欺瞒、讳灾讳盗、粉饰太平的做法,导致各地反抗事件频发,势将酿成全国性反清起义。

官场虽然弥漫昏聩贪腐风气,但朝野有识之士却在不同程度上感知和体认到清朝面临的内外危局。其中,龚自珍堪称典型。他高度关注和揭露各领域长期积累的弊端,敏锐察觉清朝已陷入生存危机,并发出警示称“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sup>②</sup>为此,他主张“更法”,试图推动因循守旧的朝廷走上全面改革之路。但龚自珍人微言轻,只是书生议政,根本不可能得到朝廷任何回应。他极度失望,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sup>③</sup>最先发出大规模民众反清起义即将爆发的警讯。

与思想家龚自珍不同,一批经世派官员长期任职地方,亲身体验和应对各种弊政,也感受到国势中衰。他们势单力薄,认识有限,只能在地方推行零散的兴利除弊的改革,对挽救危局并未产生实质和整体效果。随着经世派实力增长,他们逐渐形成松散的政治势力,通过多种渠道参政议政,不断扩大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他们多数出身寒门,科举入仕,比较体察中下层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危局的认知相对务实和深刻,但并未进入权力中枢,也受自身政治立场和功利的制约,故而难以从总体和全局上认知危局,也未能达到龚自珍的认知深度。

## 二、曾国藩、洪秀全对晚清危局之认知

曾国藩、洪秀全都生长于晚清,出身于农村,在家长教化和督责下,自幼接受儒学启蒙教育,立志攀登仕途。但是,洪秀全四次科考失意,就决意走上反清起义之路,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曾国藩虽屡试不中,却坚持参加科考,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跻身朝堂的美梦。可见,他们原本人生目标相同,堪称科举入仕的同路人。曾、洪对人生目标和道路抉择发生由同而异的变化,源自他们对清朝统治和时局的认知出现根本对立。

### (一) 曾国藩的危局认知

与洪秀全的农民父祖不同,曾国藩祖父力行耕读兴家,父亲自幼走读书科考之路,却屡遭失利,遂寄望子承父志,亲自调教,并将曾国藩送至衡阳双桂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接受教育,最终实现入仕目标。任京官12年间,他系统研学儒学义理、典章制度、经济实学、历朝史籍、诗词古文,任事勤勉,深受肯定,遂从七品小官跃升至二品大员,成为朝中年轻才俊。曾国藩致函祖父自夸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sup>④</sup>每次升迁,他对皇上“天恩高厚”都增加了新的体认,忠君更加理性自觉,仿效圣贤、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志向也愈加坚定。当他进入翰林院时,就致信诸弟宣示其宏大志

① 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经德堂文集》卷3,参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65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

②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③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8页。

④ 《致澄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3页。

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sup>①</sup>因此,他严格律己,周旋各方,实心办差,成为朝中稀缺的义理型经世派能员,并得到朝野官绅认可。曾国藩认定,在咸丰帝即位、太平军兴的危难时刻,就是他力挽狂澜、效忠报恩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连续上疏,揭举朝廷弊政和危局,提出应对和改革方略。奏疏涉及吏治、兵制、司法、田赋、货币、财政、治安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经世派的改革思路和举措,也反映了他兼任礼、兵、工、刑、户诸部侍郎期间的参政心得。其中,《备陈民间疾苦疏》直击朝廷忌讳的敏感议题,堪称经世派高官对危局认知的经典之作。

曾国藩认为,当前危局的关键是民心涣散。其原因是:“……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民间普遍存在三大疾苦:1.“银价太昂,钱粮难纳”;2.“盗贼太众,良民难安”;3.“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sup>②</sup>若能破解,即可挽回危局,重建康乾盛世。此疏虽然直击地方弊政之重症,但仍落入皇上圣明、朝廷正确、罪在地方的俗套,论述逻辑并无新意。

其实,曾国藩对皇帝及朝廷也颇多不满。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批评道光帝以“镇静”取才的政策,造成官员“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他认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还痛批京官尸位素餐,粉饰太平,“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sup>③</sup>此疏几乎完全否定了道光后期的官场生态。他甚至对当朝的咸丰帝也有微词,不惜冒险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规劝皇上自制自律,率先垂范,扭转官场风气,挽救全国危局。<sup>④</sup>

可见,曾国藩意识到清朝已深陷全局性危机。中下层民众苦于地方暴政肆虐,民怨沸腾、民心涣散。他对比康熙帝成功逆转凶险危局、道光帝却难以脱困振作的事例,认为失败的症结是人才政策失误,导致官场风气和吏治普遍败坏。地方守令滥施暴政,阻断下情上达渠道,致使皇帝、朝廷不悉下情,德政不能落实到基层民众,从而酿成官逼民反的危局。因此,亟待咸丰帝除弊图新,实行新政,力挽危局,振兴大清。曾国藩对危局的分析解读颇具深度,奏疏因此震动朝野。咸丰帝上谕表示宽容嘉纳,经世派同僚群起赞扬。曾国藩则自居忠臣,致书家人,称此疏“恐犯(咸丰帝)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sup>⑤</sup>其实,曾国藩对内忧的认知远不及龚自珍的论述全面深刻,对外患的认知更加盲目肤浅,明显落后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论述,也未能超出嘉庆帝罪己诏的认知水平。与洪秀全的反清论述比较,双方则截然对立而鲜有交集。

## (二) 洪秀全的危局认知

洪秀全父祖世代务农,他是家中第一位上学读书、尝试科举入仕的子弟。但是,洪秀全只具有启蒙和自学的儒学知识,与曾国藩相比,缺乏系统深厚的儒学功底。而且,他身处广州近郊,受到天地会“反清复明”思潮和西方基督教的双重影响,对满族皇帝及朝廷的忠诚度不高,故而在科考连次失利时,就对清廷极度失望,由此催生改朝换代的反清思想。之后,洪秀全选择性地移植基督教义,创立新的宗教,撰写了传教文章《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起义后,以东、西王名义发布三篇诰谕,宣示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教和政治纲领。纵向检视这些文献,表明洪秀全对晚清危局的

①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家书之一》,第34页。

② 《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册《奏稿之一》,第40—43页。

③ 《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册《奏稿之一》,第5—8页。

④ 参见《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册《奏稿之一》,第23页。

⑤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家书之一》,第190页。

认知经历了从隐晦到公开、从宗教到政治的话语转换与升级过程。

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萌生反清意识后,密切关注现实局势,经常与同道亲朋“谈经论道,终夜不倦”,“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sup>①</sup> 他向洪仁玕阐明自己的反清论述称:

(中国)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 贫者安能守法? 不法安得不问伊犁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 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sup>②</sup>

以东、西王名义发布的诰谕更揭露了清廷暴政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

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殍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sup>③</sup>

与曾国藩绝对效忠清朝相反,洪秀全彻底否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认定,满清朝廷是造成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水旱灾害、民众贫穷、官吏贪腐、司法不公、人才绝望、英雄罹难的罪恶之源,也是酿成当前危局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这不只是清朝危局,而是中国面临的危局,也是人民和民族的苦难。因此,洪秀全决心寻求真理,努力探索走出危局、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宗教和文化领域,洪秀全与曾国藩的论述更极端对立。

洪秀全推崇上帝信仰,撰写《原道觉世训》,宣传“皇上帝乃是真神也”,号召凡人崇拜上帝。但“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误拜各类偶像。“皇上帝乃是帝也”,历朝皇帝竟然“僭越于其间……敢颺称帝者……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sup>④</sup> 更影射咸丰帝为当代阎罗妖,“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sup>⑤</sup> 东、西王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更点名痛批,“今满妖咸丰,原属胡虏,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sup>⑥</sup> 此谕中公开列为必诛的民族和宗教公敌咸丰帝,却正是曾国藩效忠图报的圣主。

与洪秀全针锋相对,曾国藩奉诏组建湘军,出征参战,发布《讨粤匪檄》。该檄文称:

① 洪仁玕《英杰归真》,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② 洪仁玕《英杰归真》,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第279页。

③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5页。

④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第31页。

⑤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第28页。

⑥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7—108页。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sup>①</sup>

前文曾述,曾国藩上疏指出道光、咸丰父子德才有瑕,但在讨伐洪秀全的檄文中,却隐瞒世人,宣扬清朝“列圣”表扬“今天子”“敬天恤民”“深厚之仁”;对官府暴政和官逼民反的危局只字不提,却历数太平天国的种种罪孽;并将起义原因说成洪秀全等“用夷变夏”、发动了“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绝非只是针对“我大清之变”等等。曾国藩这番说辞意在掩盖即将引爆的官民、贫富、满汉、中外四大矛盾叠加的危局,动员汉族地主士绅及群众追随湘军,参与卫道,助饷助剿,保全家产,报效朝廷。

事实表明,曾、洪的阶级和民族站位对立,利益和目标追求相殊,造成双方对清朝危局的认知产生本质差异。洪秀全兼具士农双重社会心态,能够以士人的视野,比较理性地观察和思考农民的苦难与诉求,敏锐感知和触及四大社会矛盾交互激化的现状。他认定,清朝皇帝和朝廷是危局的制造者,绝不可能改恶从善,故而寄望清廷自行改革弊政,藉以化解矛盾、挽救危局、拯救苦难的中国和民众,是绝对行不通的。曾国藩则相反,他秉持忠君报国的理念,心怀改善和强化清朝统治的愿望,观察和分析朝廷危局,其认知程度比同僚固然全面深刻,但并未逾出经世派的认知范畴。与洪秀全相较,他只关注吏治败坏、政策缺失所引发的多种弊政和危局,其认知焦点局限在官民矛盾,从不涉及清帝皇权和朝廷体制,也淡化和回避了现实存在的贫富、满汉、中外三大矛盾。因此,他认为,清朝危局绝非不治之症,完全可以自行整治和修复。

### 三、洪秀全、曾国藩拯救危局的道路抉择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面临严重危局时,为拯救危局,往往出现不同的道路抉择。一般而言,若朝廷能够掌控抉择主动权,善于利用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动兴利除弊的改革,自行缓和社会矛盾,可能成功缓解和拯救危局,实现延续王朝的目标。若朝廷拒绝改革,或改革失败,各种社会矛盾交互激化,引起社会动乱,危局遂恶性发展,转化为乱局,朝廷因此丧失抉择主动权。同时,下层民众为寻求生存,被迫自行抉择,兴起自下而上的反抗暴政的起义风潮。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某些势力乘机崛起,镇压或利用下层起义,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洪秀全和曾国藩则是在晚清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借鉴了过往拯救危局的历史案例,上演了新的历史活剧。

洪秀全的抉择是,利用宗教,发动起义;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推翻清朝,创建新朝。其斗争矛头直击咸丰帝及满族权贵。东、西王发布的诰谕宣示,“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况尔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须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灭妖”“尔等凡民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庶几常生有路,得享天福”。<sup>②</sup> 洪秀

<sup>①</sup>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4册《诗文》第140—141页。

<sup>②</sup>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7—108页。

全设想,只有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实现王朝、宗教、文化、社会、国民的革故鼎新,才能最终建成《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世界,“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sup>①</sup>他关注历代农民起义和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活动,分析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如肯定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否定黄巢、李自成起义;肯定和继承天地会“反清”目标,但废弃陈旧的“复明”目标及各种陈规陋习。他借鉴传教聚众的起义案例,传播上帝信仰,秘密动员、组织民众和建立基地,完成起义准备。金田起义后,宣布建国登基,开创新朝。建都天京后,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拟定太平天国未来的土地制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社会、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制度和政策。但该文件印数极少,曾国藩幕府多方搜求未能如愿,被俘太平天国官员也未见过。看来,洪秀全等人可能决定在推翻清朝后实施《天朝田亩制度》,故而未曾向官民公布颁行。

可是,长期战乱,新朝覆亡。虽然《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制度终未实行,但这一制度却体现了广大贫苦农民最迫切的经济诉求。外国传教士可能最早从太平天国高层获得赠本,<sup>②</sup>1854年9月9日,有人在《北华捷报》发表评论称“这个样本是异常可嘉的……起义政府制定的条文对整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关心。它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保护他们的人民的安康,这使得那些欧洲所谓文明政府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羞愧。”<sup>③</sup>评论高度肯定文件条文关心每个社会成员,显然包括下层贫苦群众,凸显新朝施政最基本的原则是保护人民安康,这一点连欧洲列强也相形见绌。由此可见,实现改朝换代不是洪秀全拯救危局的终结目标,更宏伟的理想目标则是建设“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洪秀全不仅宣示要推翻旧王朝,铲除中国内忧外患危局的祸源,而且设想在新朝治理下,推行新制新政,旨在实现大同社会。就实践层面而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他既未能推翻清朝,更无法实现未来的理想目标。从主观因素考察,起义后,洪秀全等人逐渐背离理想和初心,急切建立新朝,称王建制,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和话语复制了旧朝体制和制度,他们也迅速转化为新朝权贵,致使太平世界和大同社会的理想都成了具文。

洪秀全向人民宣示了新世界的美好愿景,行动上却疏离贫苦民众,深陷旧世界的泥淖。如何看待和解释洪秀全理想和实践的的巨大落差,也成了学界争议的热点。笔者认为,历史人物的理想与实践存在落差是正常现象,洪秀全并不例外。我们既不能忽视洪秀全的思想、实践的严重缺失,片面强调和高估其理想,美化和拔高这位起义领袖;也不能以今律古,聚焦和夸大洪秀全的时代局限和个人错咎,甚至重复清方的诬枉不实之词,否定洪秀全反清反侵略的坚定意志和实践,歪曲和抹煞其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甚至恶意妖魔化这位起义领袖。

同时代的曾国藩,在道光朝因迅速升迁,对皇帝与权臣穆彰阿感激涕零,从无疏奏指摘朝政。咸丰帝即位,穆彰阿失势,他才连续上疏,批评道光朝政,吁请咸丰帝认清形势,吸纳朝臣改革建言,立即推行新政,兴利除弊,拯救危局。但是,这些治标举措,其起点和归宿都是维护和加固清朝皇权及当时体制。至于曾国藩自诩“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规劝皇帝补强圣德的奏疏,已被精心磨光了棱角,通篇充斥迂回委婉的话语。即便如此,咸丰帝对这份涉及圣德的条陈,反应却异常强烈,将奏折掷之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后经几位权臣哀求,曾国藩才幸免于罪。<sup>④</sup>接着,咸丰帝又改

①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第27页。

② 类似例证有,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年)十一月给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的赠本。

③ 转引自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④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1,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页。

变态度 刻意发布长篇上谕 针对曾折 详加辩驳: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朕欲求献纳之实,非沽纳谏之名,岂得以“毋庸议”三字付之不论也?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令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志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戒……朕深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傲,庶坐言起行,国家可收实效也。<sup>①</sup>

皇帝坚决否认曾国藩微词影射,声称自己一向从谏如流,从无“以‘毋庸议’三字”拒谏之事,并反批曾国藩过激、拘执,还显示包容大度,“不加斥责”。其实,咸丰帝即位后,根本不想纳谏改革,除了罢降穆彰阿、耆英,原班高官仍盘踞朝廷,朝政未见改善。曾国藩对此深感失望,遂萌生退意。1849年,为准备庆贺其父次年60寿辰,他致信诸弟,决定“乞假归省”:“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sup>②</sup>可见,在催生咸丰“元年新政”的心愿破局后,曾国藩已心灰意冷,遂作出新的抉择:远离朝廷,归养尽孝。及至1852年其母去世,曾国藩获假返家丁忧,得以实现两年前的抉择。看来,他不能在朝兼济天下,只好回乡修身齐家,做湖南一流乡绅。

可是,曾国藩的乡绅梦又遭破灭。当时,太平军正围攻省城长沙,攻防战局旷日持久,湖南秘密会党纷纷起事响应,全省动荡,曾国藩等在籍高官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乡绅梦难圆,战乱迫使曾国藩必须作出新的道路抉择。但身为在籍文官,如何应对战乱,也是新的人生命题。经过一番犹豫徘徊,曾国藩决定告别乡绅梦,作出墨经从戎、组建湘军的重大抉择,由此改写了他人的人生,也书写了拯救危局、延缓清廷寿命的晚清史。

促成曾国藩作出新的抉择的原因主要有五条:1. 忠君报国的政治立场。曾国藩返乡前后,曾家已经与湘乡官府合作,组建团练武装,防范太平军侵扰,镇压地方动乱,保卫县境治安。2. 保护乡绅地主阶级利益。湘军所到之处,以保护乡梓动员当地乡绅、地主、士人加盟,带领农民参战。3. 个人政治欲望。他素怀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刻意塑造内圣外王、古今完人的高大上形象,并为此努力学习和任事,其学问、人品、官品之口碑甚佳,领导力和执行力得到朝野肯定,在湖南官绅学界素有威望。返乡归养,实属事出无奈。他在等待新的机遇,以便再度出山,建功立业,展现德才,实现抱负。郭嵩焘即以此激励曾氏接受诏命,墨经从戎。4. 湖南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南是经世派重镇,曾国藩多年结交经营,形成声气相投、关系亲密的拥曾势力。有些官绅已经组建乡土武装,参与战事。一旦曾国藩登高呼唤,他们便迅速响应结集,组成凝聚力极强的精英团队,追随曾氏从征,打造地方军事集团,抱团谋取功名利禄。5. 朝廷的指示和支持。咸丰帝诏命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首领,为其新抉择搭建了合法平台。两任巡抚都认真落实诏命,敦请和促成曾国藩出山建军,为曾氏提供了人、财、物的保障。当时,还有安徽等省也诏命在籍高官帮办团练,却基本未能成功,除了任事者智慧、能力

① 贾慎等修《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32,咸丰元年四月壬午,中华书局2008年版,总第1768—1769页。

②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家书之一》,第176页。

不足外,地方官府不愿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经过多方考量精算,曾国藩决意抓住新机遇,作出新抉择:夺情从军,“以身许国,愿死疆场”。<sup>①</sup>

湘军草创始初,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令其开赴各地,镇压会党。此时,他凶相毕露,绝口不提以往上疏所言民众反抗、“盗贼众多”源于官吏暴政,竟将会党起事原因说成地方官吏苟且偷安、不敢杀人所致。他奏称:“湖南会党众多,‘有司……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为此,他决心大开杀戒,誓言要杀尽这些数十年逃过屠刀的会众,‘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虽)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sup>②</sup>于是,他先在长沙试刀,“诛戮不过数十人,而远近为之震慑。风声所树,其效立见”,<sup>③</sup>接着,在湘南各县清剿数月,每次杀戮则以百人计数。之后,湘军将杀戮推向沿江各省,所到之处,血雨腥风。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曾国藩则如愿以偿,封侯拜相,被其门徒贴上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一代完人”的标签。洪秀全却被打翻在地,被构陷为十恶不赦、祸害中国的一代罪魁。但是,虚构和颠倒的评价难以掩盖真实的历史。从当时中外正义人士的记载,到后世谭嗣同、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的评判,及至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不断深入的研究,逐渐还原了历史真相,对曾、洪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作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定位和评价。但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告别革命”论的提出,再度泛起扬曾贬洪的声浪,其论述却是重复晚清官方的基调。

史实表明,对晚清出现内忧外患的危局,洪秀全的认知比曾国藩的更深刻,论述更全面真实。他拯救的对象不是清朝,而是中国,其道路是发动自下而上的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创建新朝,再进行制度变革,建设饱暖均匀的太平世界,最终达成大同社会的理想目标。曾国藩则竭尽心力效忠与拯救清朝,并视朝廷为中国。他先是积极建议皇帝推行体制内改革,缓解社会矛盾,拯救危局;但皇帝无心改革,遂消极返乡归养;终因捍卫其阶级利益和清朝生存而奉诏建军出征,走上镇压反清起义的不归路。洪秀全虽败犹荣,他所开辟的反清起义道路被孙中山借鉴、继承和实践,最终完成倾覆清朝、建立民国的历史使命。曾国藩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清朝也在湘淮新贵的参与下推行了洋务新政,但并未缓解各种固有矛盾,也无力拯救持续深化的危局,最终被自下而上的反清起义风暴所摧毁。

## 太平天国:造反者的失败事业

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一、大是大非 “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无理”?

2006年,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举办的太平天国专题研讨会上,章开沅先生作了“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的发言。在论及太平天国的是非功过时,他重申了“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

① 《致澄弟》,《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家书之一》,第585页。

②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册《奏稿之一》,第72页。

③ 郭嵩焘《致李玉阶》,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74页。



是非能上历史台面的都是大是大非。就大是大非而言,问题非常清晰,即所谓“造反有理”。……太平天国从总体来说仍属“官逼民反”,实乃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相激化的结果。民众奋起反抗清朝的暴虐统治,仅此一点即可肯定其为“是”。<sup>①</sup>

究竟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无理”?这确实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章开沅明确持“造反有理”说。而“造反有理”的论断,追根溯源,最初为毛泽东于1939年提出。是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sup>②</sup>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在斯大林诞辰70周年前夕(1949年12月20日)重新发表于《人民日报》。上引有关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更于17年后的1966年为人们所熟知。<sup>③</sup>

毛泽东有关“造反有理”的论断,言简意赅,旗帜鲜明。这一论断是否确为马克思主义的精要概括,见仁见智,这里不作辨析;但它无疑是对“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刻认识和极好总结。

发端于秦汉、兴盛于唐宋、烂熟于明清的中国传统时代,前后历时二千余年。这是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时代。在中国传统时代,“谋反”是“十恶”之首。清王朝肇兴之初,曾多次大赦天下,但“谋反”等“十恶”均不在赦免之列,即所谓“十恶不赦”。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造反”,不仅有谋划,且付诸行动,公然揭帜,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十余年的全国性政权。这于清王朝而言,当然是大逆不道之举。前些年,有人热衷于将太平天国的宗教称作“邪教”,企图借此否定太平天国。其实,所谓“邪教”只是中国历代王朝贬斥民间宗教的政治性用语,而“谋反”性质之严重,远非“邪教”所能及。清王朝在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事时,即确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原则,业已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后来在镇压天理教起事时,嘉庆帝更强调“但诛叛匪,不诛邪教。……其平日虽系习教,而此次并不谋逆,亦不深究”。<sup>④</sup>

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也曾被官方目为邪教,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天主教的弛禁,整个基督宗教在中国已合法化。太平天国的宗教源于西洋的基督教。曾国藩在其著名的《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国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但在提及其宗教时,也只是说其“窃外夷之绪,崇天主教”。

① 章开沅《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又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③ 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于第6版发表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引述了毛泽东有关“造反有理”的论断。相关引述为清华附中的学生群众组织“红卫兵”所注意并在大字报中加以转引。同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对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两张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④ 《清仁宗实录》卷282,嘉庆十九年正月丙寅。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是极为赞许的。同在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作了如下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sup>①</sup>

这就是说,农民们的“造反”,虽然不免成为地主和贵族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但还是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对于清王朝的“造反有理”,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也正如前引章开沅所说,“太平天国从总体来说仍属‘官逼民反’,实乃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相激化的结果”。

## 二、清王朝走向了反面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马背上得天下,有其强悍的统治风格。它以武力东征西讨,于乾隆中叶(18世纪50年代)平定西域准噶尔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而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也十分严密。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不惜屡兴文字之狱。乾隆朝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繁荣均已超越康雍两朝,而其文字狱和禁毁书之严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朝因文字而获罪的多为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讽,触犯圣讳,措辞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伏”。<sup>②</sup>清人龚自珍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sup>③</sup>这正是对当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所谓“太平盛世”的莫大嘲讽。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一般都经历了兴盛衰亡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作为各朝代通病的吏治腐败问题,亦于其衰亡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致是在乾隆末年。吏治问题,尤其是官场贪腐窝案,则在其后的嘉庆年间变得愈益突出。新晋官场者,大多默认其潜规则,甘心或被迫同流合污;少数以清白自矢者,则不为官场所容,甚或招致杀身之祸。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典型,为发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江苏山阳知县王伸汉因冒赈而毒杀查赈委员李毓昌案。在皇帝亲自过问下,案情真相被查明。毒杀委员的山阳知县被处斩,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sup>②</sup> 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5页。

<sup>③</sup> 龚自珍《咏史》,《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1页。

以下多位要员被革职。嘉庆帝为此感慨“吏治败坏已极”指斥贪腐官吏“行为竟同盗贼”。<sup>①</sup>

到了道光年间,周天爵更提出“贪与廉皆不能办事”的著名论断。据记载,道光十年(1830),周天爵迁任陕西布政使。在陛见召对时,皇帝问他“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他即向皇帝直言:乾隆朝的大吏们“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而道光朝的官员,“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道光帝为之“动容称善”。<sup>②</sup>

所谓“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最为明显的标志。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国内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各阶级之间,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级官府,首先是州县的所谓“亲民之官”,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把战费与赔款的负担转嫁到广大纳税者,尤其是贫苦农民头上,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即鸦片战争后不久,两江总督耆英向皇帝汇报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sup>③</sup>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广东学政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内阁侍读学士董瀛山向刚即位的咸丰帝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sup>④</sup>

咸丰元年底(1852年初,此时太平天国业已揭帜),时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更进一步把“民间疾苦”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条都与吏治的良否、民心的向背有关,而以第三条最为突出。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不难体察。<sup>⑤</sup>

差不多与此同时,天地会所张贴的《万大洪告示》则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sup>⑥</sup>

各地民众的造反起事,终于汇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革命。

### 三、洪杨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造反

太平天国揭帜起义之前,天地会乃是最活跃的秘密社会组织,并在中国南方取得了支配地位。天地会兴起于乾隆年间,其历史较太平天国起事之前的“拜上帝会”<sup>⑦</sup>长远得多,其别称则有三合会、添弟会等,分支甚多,分布极广,其组织形式也颇具生命力。但由于其各山堂互不统属、成员多为江湖游民的特点,天地会的起事始终不能突破“随起随灭,随灭随起”的格局。

以洪秀全与杨秀清为首的拜上帝会领导核心,是根本瞧不上天地会的。洪仁玕口述、巴色会教

①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15,嘉庆十四年七月己巳;卷216,嘉庆十四年八月丁丑。

② 李滨《中兴别纪》卷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4页。

③ 《道光朝留中密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69—470页。

④ 徐珂《清稗类钞·谏诤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文宗实录》卷7,道光三十年四月丙寅。

⑤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光绪二年(1876年)传忠书局版。

⑥ 荣孟源《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5—116页。

⑦ 按“拜上帝会”一语,源自《太平天国起义记》英文原版所附汉字,实乃时人对洪秀全、冯云山等宣扬敬拜上帝而形成的宗教团体的他称,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并无“拜上帝会”之说。

士韩山文笔录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了洪秀全的有关议论,他说:三合会(天地会)的宗旨在“反清复明”这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还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多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三合会又有种种恶习,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他们原有的真宗旨如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了。

拜上帝会将清朝官军和天地会武装都贬斥为“妖”,并采取了“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意”然后举事的策略。

拜上帝会有信仰,有纪律。它的兴起,离不开洪秀全、冯云山宣扬敬拜上帝,更离不开杨秀清、萧朝贵假借天父天兄下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拜上帝会最初的四人核心中,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获知拜上帝教义,又曾去广州传教士教堂研习过《圣经》,是会众心目中最具人望的“洪先生”;冯云山为洪秀全同窗书友,也是其敬拜上帝信仰的忠实追随者,热心在紫荆山区宣传布道;杨秀清家境贫寒,父母早逝,本人不识字,但性格坚韧倔强,机警过人,是拜上帝会的中坚人物;萧朝贵是杨秀清在紫荆山内的近邻,也是其密友,他在拜上帝会内部核心地位的取得,则是因为杨秀清与其妻杨宣娇结拜为兄妹。在太平天国文献《天兄圣旨》中,洪、冯、杨、萧四人的称呼,乃是依结拜兄妹的年齿为序,分别为二兄、三兄、四兄及妹夫。

从其出身来看,洪、冯出生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杨、萧则以耕山烧炭为业。他们和拜上帝会的其他成员,都是有家室并有正当职业的农民。

但清朝当局及时人对洪杨等人身世的认知却十分离奇。如清方情报官员张德坚所撰《贼情汇纂》,记叙洪秀全的身世为: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所记杨秀清身世亦大致与洪秀全同,且叙其结党护送商货而得洪秀全信任云云。<sup>①</sup>相关记载显然得自传闻,且附会了天地会某些成员的污浊行径。

拜上帝会于庚戌年(1850年)发动的武装起义,是切切实实的农民起义。其会众毁家纾难,阖家或举族投军,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有其现实的原因。拜上帝之人多为客家农民,庚戌年间广西多地爆发大规模的土客械斗,这是拜上帝会不得不实行武装团营以自保的外部因素;而广大拜上帝之人所憧憬的地上天国,则是其团营起义的内部动力。

拜上帝会团营之初,曾有天地会武装前来投营,但除罗大纲留下外,其余几股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都因受不了拜上帝会严苛纪律的约束而先后叛降清朝当局。

拜上帝会在庚戌年十月初一日于金田公开揭帜起义并取得胜利之后,于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热烈祝贺了洪秀全的38岁寿辰,并宣布以次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改地支“亥”为“开”)。之所以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显然是因其为太平天王所治理的国家。<sup>②</sup>“太平”者,治之至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之称,则源于基督教之《圣经·新约》。<sup>③</sup>

太平天国在占领永安后,进一步完善了以杨秀清为正军师的军师负责制,并以天王洪秀全的名义褒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五王,明确宣布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43、45页。

② 太平天国将“國”写作“国”,内中为“王”,含王居中治理天下之意。

③ 按《圣经·旧约》(太平天国称《旧遗诏圣书》)中无“天国”之说,《新约》(太平天国称《新遗诏圣书》或《前遗诏圣书》)则多处提及。如《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和合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制”。杨秀清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崇地位。太平天国起义也因而被世人称为“洪杨之乱”或“洪杨革命”,甚至被附会为“洪杨劫”。<sup>①</sup>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也郑重其事地将洪秀全与杨秀清并称“首逆”。

洪杨两位首领并列,是太平天国的特有现象。的确,没有洪秀全便不可能有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甚至也不会有“太平天国”的国号;但如果没有杨秀清,洪秀全尽管有做“天下真主”的野心,充其量也只能继续当一名基督教的布道士。

多年后,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统帅李秀成在回忆起杨秀清时,仍充满了敬意。他说,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时,“并不知机”,但自从敬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他衷心赞许道“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sup>②</sup>

如从丁未年(1847年)洪秀全于广州西去桂平紫荆山算起,直到丙辰年(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为止,洪杨整整联手了十年。这十年是太平天国(包括其前身拜上帝会)事业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十年。可惜由于“逼封万岁”的鲁莽之举,杨秀清本人及其数万部属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太平天国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天京大变乱之后,原有的领导层几乎凋零净尽。集“主”与“军师”权力于一身的洪秀全,沉湎于宗教的幻想之中而不能自拔。只是由于清王朝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泥淖之中,加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历尽艰辛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又任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班新人,才使太平天国有重新振作的迹象。

清王朝在咸丰帝死后,一面维持了“中外和好”的局面,一面更加倚重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曾氏所扶植的李鸿章淮军集团也乘势而起。在清王朝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共同镇压下,太平天国终于在甲子十四年(1864年)遭到了失败。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 四、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章开沅先生认为:农民战争如果说有功,主要是破坏,反抗就是破坏。太平天国的14年可以说是与战争相伴始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他们在浴血奋战之余营造偏安于江南的局部盛世景象。<sup>③</sup>

我要在此补充强调的是:太平天国于晚清社会的最大贡献,乃是在其占领地区相当彻底地破坏了清王朝的地方统治秩序,摧垮了已成社会痼疾的旧有官僚体制,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集团,乃至后起的李鸿章淮军集团,轻易地清除了他们的政治对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吏治。

太平天国不仅有“破”,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同样有“立”,也即建设性贡献。据记载,清军重新占领苏州后,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对阊门外所建题为“民不能忘”的汉白玉牌坊耿耿于怀,责问“阊门外白石牌坊何以建于伪忠王耶?”他得到的答复是:牌坊为担任乡官者所捐建,建牌坊乃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减粮”政策。<sup>④</sup>这使他深受刺激。正是在李鸿章主政期间,苏州等地终于成功减赋,解决了数百年积重难返的一大弊政。

① 古人认为每60年便会发生一次丙午、丁未之厄,也即以这两年为灾祸之年。天干之丙、丁和地支的午都属火,为红色,而未在生肖上是羊,于是丙午、丁未之厄又被称作“红羊劫”。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在这两年,但因其主要领导人姓氏的谐音,亦被附会作“洪杨劫”。

②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35页。

③ 参见章开沅《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参见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9页。

与历史上“成功转型”的刘邦、朱元璋等辈不同,太平天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农民造反者以兄弟姊妹相称的朴素情怀。张德坚的《贼情汇纂》里,即收有“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向“我主二兄”启奏的“本章”。而天王洪秀全在答复的“御照”中,称杨、韦、石等人为“胞”,也即同胞兄弟。直到太平天国后期,以幼主名义发布的诏书中,依然称陈玉成、李秀成等臣下为“叔”。

以捍卫纲常名教自诩的曾国藩在其《讨粤匪檄》中回避了太平天国反抗满清王朝的问题,却对太平天国的所谓天下之人皆为兄弟姊妹的说法大张挞伐,将其曲解诬蔑为违反人伦而必须加以讨伐的滔天大罪,并认为孔子孟子也要为此痛哭于九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氏发表这篇檄文的90年后,也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大肆宣讲鼓吹曾国藩虽功高权重但无意于反清,因而“主张抗日者必遗臭万年”,又下令各学校向学生详细解释曾氏的《讨粤匪檄》,以此作为对坚持抗战的国共两党的声讨。<sup>①</sup>这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是旧式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早在占领南京之初,它即有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问世;而在其后期,更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如果说前者还只是面向过去,后者则完全是着眼于现实与未来。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在上海得见《资政新篇》,惊叹“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sup>②</sup>

太平天国虽然是造反者的失败事业,但农民英雄们所建立的功勋,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 历史虚无主义与《太平杂说》

华 强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包树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历史虚无主义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政治企图的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偏概全,打着所谓考证和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旗号,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政治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其要害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泛起,其中太平天国研究是重灾区。

### 一、《太平杂说》引发学术争鸣

21世纪初,上海某文学家将他在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有关太平天国的随笔、杂文等35篇汇编成册,取名《太平杂说》(以下简称《杂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为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说“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划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sup>③</sup>“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

① 参见雯雯《一个“良民”在沦陷区的见闻与感受》,“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PiOe\\_wM08KyI3KVZGss0A](https://mp.weixin.qq.com/s/HPiOe_wM08KyI3KVZGss0A) [2018-04-12]

②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③ 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sup>①</sup>该文学家认为洪秀全是魔鬼。此后,他陆续发表数篇丑化太平天国的文章,其思路和观点是《杂说》的延伸和放大。

《杂说》出版后,夏春涛等许多学者撰文予以批评,并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在学界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严重败坏了学风。“例如,前述《太平杂说》的作者自称该书仅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同时又自诩该书揭开了太平天国‘被冷藏的真相’”。<sup>②</sup>《杂说》对太平天国所谓“冷藏的真相”的揭露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上帝教是典型的政治邪教;二是洪秀全是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的魔鬼;三是《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毫无进步意义。

2003年,笔者在《探索与争鸣》发表《如何“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兼评当前影视历史人物的塑造》,对当时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提出看法。《探索与争鸣》决定在杂志上辟专栏开展讨论,相继发表了争鸣双方不同观点的文章。笔者在《探索与争鸣》先后发表《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也谈对太平天国的两个纲领及洪秀全的评价——与潘旭澜先生商榷》,文学家在《探索与争鸣》发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再论〈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关于洪秀全答“商榷”者》。此外,杂志还发表了彭学涛、方之光、毛晓玲、史式、黄敏兰等作者的争鸣文章。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针对《杂说》在《光明日报》集中发表一组文章,其中笔者发表的文章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的点滴思考》。《杂说》引发的学术争鸣围绕着三点所谓“冷藏的真相”展开。

## 二、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必须让群众披上宗教的外衣

《杂说》称太平天国上帝会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

邪教是什么?邪教是一个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其特征是以传播宗教教义、拯救人类为幌子散布谣言,对社会、个人造成危害。邪教主往往自称具有超自然力,以秘密结社控制群众,宣扬世界末日,达到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的宗教组织认为非本教即邪教。邪教与宗教虽一字之差,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宗教倡导信徒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维护社会和谐。邪教则蛊惑成员仇视社会、危害社会,制造社会末日。对照上述邪教的定义和特征,太平天国绝不是什么邪教。

《杂说》之所以认为太平天国是邪教,是因为上帝会成立之初借用了“降僮”仪式。广西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在封建社会盛行“降僮”一类的宗教迷信活动。回顾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都借用了形形色色的宗教。古今中外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披上宗教外衣?恩格斯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sup>③</sup>因此,一个多世纪前,太平天国利用“降僮”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没有什么奇怪,不能因为利用了“降僮”就成了“邪教”。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一书以“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证”作为结束语。李文海概括说“《天国的陨落》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指出,从宗教角度来说,作为从正统宗教分化

① 潘旭澜《洪秀全的真实面目》,《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

② 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出来的异端教派,民间教门为了减缓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在创建初期通常以正统宗教相标榜,因而遭到后者的排斥,贬之为邪。这种围绕‘正’、‘邪’的纷争反映了正统宗教对民间教门的打压立场。”<sup>①</sup>清政府称太平天国是邪教,根源在此。

太平天国在清代不仅被称为邪教,而且被称为“匪”和“寇”。孙中山最早为太平天国正名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四年……彼曾、胡、左、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sup>②</sup>

民国时期,蒋介石下令将太平天国正名为“民族解放运动”,称“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sup>③</sup>国民党中央随后颁布《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禁止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读物上攻击太平天国。

### 三、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1949年6月,毛泽东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sup>④</sup>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太平天国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外涌现出一批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历史虚无主义者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以片面和静止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sup>⑤</sup>《杂说》对洪秀全的评价就是这样,认为洪秀全是“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sup>⑥</sup>

《杂说》怀疑洪秀全是否称得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谈真理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19世纪40年代,在闭关锁国的中国,寻找到西方主张博爱的上帝,寻找到西方主张平等的基督教,这对洪秀全而言就是真理。洪秀全以平等为号召,宣传“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在南中国掀起革命风暴。茅家琦评价说“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西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在动员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投入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sup>⑦</sup>

《杂说》指斥洪秀全说“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不能靠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从而导致太平军迅速地覆灭。正是他的死亡,中国才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极其沉重的一页翻过去。”<sup>⑧</sup>作者对洪秀全的丑化全然不顾历史真相。

太平天国起于乱世。清朝经康乾盛世转变到衰世和乱世,龚自珍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容闳认为,当时如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太平天国在南中国爆发,为什么迅速得到老百姓的呼应?李秀成说,广西百姓追随太平天国,

① 李文海《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作“邪教”——夏春涛〈天国的陨落〉评介》,《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28日。

② 孙中山著、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册),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12—313页。

③ 蒋介石、白崇禧、于右任《太平天国诗文钞》,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序”。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⑥ 潘旭澜《太平杂说》,第220页。

⑦ 茅家琦《基督教、儒家思想和洪秀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⑧ 潘旭澜《太平杂说》,第220页。



“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sup>①</sup>是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加上灾荒连年、鸦片泛滥,导致广西社会极端贫困化,百姓无以为食。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洪秀全,也否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杂说》认为“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sup>②</sup>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洪秀全和历史上的农民领袖犯上作乱,十恶不赦。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前后开支军费4.2亿多两白银,造成清王朝财政空虚。太平天国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洪秀全去世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落下历史帷幕。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历史研究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把被地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和渗透是一场尖锐而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sup>③</sup>《杂说》没有将洪秀全“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将孙中山已经颠倒过来的太平天国历史重新颠倒到清政府的立场上,称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为“匪”“寇”“贼”,并标榜为“全新视角”,这就是“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吗?

#### 四、人口过量死亡七千万是谬说

《杂说》称太平天国时期“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千万”。虽然这个观点是引用,但由于《杂说》的出版发行,流毒甚广。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以七千万乃至1.6亿过量人口死亡之说撰文攻击太平天国。所谓太平天国过量死亡人口多达七千万完全是谬说,1.6亿更是天方夜谭。

太平天国立国14年,中国除正常的局部水涝旱灾外,并没有特大的灾情和瘟疫,竟然仅五省人口就死亡七千万?平均每年死亡人口达500万?为什么研究太平天国的众多学者在太平天国汗牛充栋的资料中没有看到?在冷兵器时代,太平天国时期中国死亡人口竟然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能够让人相信吗?<sup>④</sup>

太平天国兵锋触及18个省,但政权控制范围在苏、浙、皖、鄂、赣、闽数省,因为太平军旋进旋退、旋占旋失,后期相对稳定的控制范围主要是江浙皖三省。就是江浙皖三省,太平天国也没有全部控制,例如江苏,太平天国控制范围主要在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多为清政府控制。

太平天国当时治下的人口有多少呢?《北华捷报》对太平天国控制的江浙皖三省人口曾经有个统计:“对这三个为太平军所盘踞的省份,本报也同时保有可靠的材料,如将太平军从南方入侵这几省前的居民人数大致计算一下,则江苏的人口应为37,843,501人,安徽为34,168,059人,浙江为26,256,784人。拿总数来说,大约为一万万人。”<sup>⑤</sup>这个统计应当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的数据。

①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页。

② 潘旭澜《太平杂说》,第1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页。

④ 参见华强、蔡宏俊《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⑤ 《太平天国管辖地区、人口与军事力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以上统计的是江浙皖三省总人口。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实际控制的人口是多少呢?英国人呤喇在其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太平天国所控制的疆域极为辽阔……自扬子江的西北向东南一带伸展,其间距离或宽或窄,自二百英里至二百五十英里不等,面积在九万平方英里以上,人口约四千五百万。”<sup>①</sup>自称“太平军上校”的呤喇曾在太平天国服役数年,与李秀成过从甚密,所说人口数据应该有一定根据。据此,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江浙皖三省总人口为一亿,而太平天国实际控制人口为4500万,《杂说》所称过量死亡人口七千万从何而来?

历史的真相是,古代历来战乱“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太平天国时期,兵锋所至,各地逃亡和迁徙人口远多于死亡人口,如无锡“邑城克服后,计民居什不存一”,<sup>②</sup>大量人口逃亡了。太平天国时期人口过量死亡有两个节点,一是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及周边城市;二是1864年淮军与常胜军由上海破苏州、无锡、常州,一路烧杀抢掠至南京。这两个节点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时候。

以太平天国时期人口减少最严重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为例,太平军攻占南京前人口260万,战后人口仅三万,是不是有250多万人死于太平军之手?不是。时人资料记载“惟念江南未破城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余万之众,破城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此时所存三万余人。”<sup>③</sup>由此可见,南京城破时死亡人口为4/10,逃亡人口为6/10。死亡人口中,死难者占3/10,死于太平军的占1/10。

那位得出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研究结论的专家指出“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sup>④</sup>1864年,淮军与常胜军在苏、锡、常攻城略地,杀人无算。史料记载,“各处烧杀抢掠,亦多有为溃败官军所为者,不尽属贼也。又官军败贼及克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sup>⑤</sup>除了清军,杀人如麻者更有土匪、溃兵等,“真贼实为数无多,皆由逃兵、溃勇先肆焚掠,居民死亡相枕籍”。<sup>⑥</sup>

清军与土匪等对城市的破坏也远超太平军。太平军占领苏州前,清军下令烧毁房屋“在叛军未到以前的数星期内,满清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这种方法被视为有效守卫苏州所必须采取的,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sup>⑦</sup>资料记载,“大部分烧毁的房屋是在叛军来到以前被满清军队烧掉的,而叛军所烧的一小部分只是为了自卫。居民自杀而死的远比遭兵燹而死的多。虽然叛军也有暴行,但比起满清的军队总要好一些”。<sup>⑧</sup>无锡的情况与苏州类似,清军攻占无锡后发现“邑城克服后……城中则贼毁其二,土匪毁其一,留防勇丁之所毁,殆不啻什之六也”。<sup>⑨</sup>

《杂说》所称太平天国时期人口过量死亡问题,据以上史料分析,一是死亡人数远远没有七千万;二是过量死亡人口不是全由太平天国造成的,土匪、地痞、流氓,特别是清军杀人对社会的破坏远超太平军。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② 《纪无锡县城失守克服本末》卷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67页。

③ 《张继庚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73页。

④ 周武《太平军与江南社会变迁》,《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⑤ 李圭《思痛记》卷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474页。

⑥ 谢家福《燐血丛钞》卷1,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⑦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28页。

⑧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38页。

⑨ 《纪无锡县城失守克服本末》卷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第267页。

至于《杂说》称“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 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这种说法也不确。太平天国曾禁止过商业,但很快改变了这一政策。资料记载,太平天国恢复商业后,天京商业街“有杂货、玉玩、绸缎、布疋、米油、茶点、海味各店,其店皆有贼文凭,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浆人衙开浆园,男女均集,贼嫌混杂,分男店女店。又有天朝鱼行,天朝腴行,腴行是肉店”。<sup>①</sup>

1863年,英国传教士卢卫廉访问天京,撰文投《香港日报》,记叙他在天京所见“南京城外商业兴旺。古老的城垣里面,田地耕种良好,四乡也一样。小麦、大麦、大豆均极富饶。城内的居民,生活显然较扬子江沿岸诸城的居民生活优裕。新的商店和优美的房屋正在建筑中。居民一般衣着良好。妇女们来来往往从事南方妇女所做的日常工作,老人们带领儿孙玩耍。”<sup>②</sup>

除天京外,苏州、杭州、常州、无锡、常熟等地商业也十分繁荣,丁葆和《归里杂诗》记太平天国治下的杭州武林门外“十里长街列市廛”;苏州成为“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sup>③</sup>此类记载甚多,不赘叙。

## 五、两个纲领是太平天国的伟大创造

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均田免粮”等口号,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关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完整的纲领。该文献的核心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其意义在于彻底否定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sup>④</sup>兵农合一、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长期处于清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夹击之中,《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没有得到实行。因洪秀全颁布《减赋诏》,许多地区的农民赋税减低近一半。1860年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洪秀全布告苏福省“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sup>⑤</sup>1861年,李秀成攻杭州,占领西兴,免除了百姓债务,当时民谣曰“长毛到西兴,债务都零清。长毛到西兴,光棍好成亲。”<sup>⑥</sup>《庚癸纪略》记吴江一带“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sup>⑦</sup>《李秀成自述》记“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听其造纳,并不深追”。<sup>⑧</sup>

《天朝田亩制度》对中国的土地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其主张与太平天国“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制定土地政策,要求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天朝田亩制度》一脉相承。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另一个重要纲领。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一个传教士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经洪秀全批准,《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正式推出,表明《资政新篇》不仅是洪仁玕的主张,更是代表中国农民阶级

①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16页。

② 转引自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 王韬《上当事书》,《弢园文录外编》卷6,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页。

④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全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⑤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⑥ 肖青《太平天国时期的民歌》,《光明日报》1958年3月17日。

⑦ 《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04页。

⑧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21页。

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自古以来“要想富,先修路”,《资政新篇》提出“行车马之利……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通省者阔三丈,通郡者阔二丈五尺,通县及市镇者阔二丈,通大乡村者阔丈余”。<sup>①</sup>太平天国在那个年代就计划将全国的大路通到省郡县,一直到乡。《资政新篇》还提出“兴各省新闻官”“兴银行”“兴邮亭”“兴医院”“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资政新篇》也是非常进步的。《资政新篇》问世后,外籍传教士称“革命军确有进步及改革之能力与趋向(观其新历之推行可为证明),此为清朝所绝不能有所表示者”。<sup>②</sup>

《杂说》称“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有较多方面的设想,是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并被倚重才出现的,在太平军中全无思想基础,更无实施可能,握有大权的诸王连看都不看,不过是一纸空文。”<sup>③</sup>此说违背历史事实。太平天国诸王彼此间有矛盾,一个传教士在天京访问洪仁玕,洪仁玕对他诉苦,“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sup>④</sup>李秀成看不起甚至厌恶洪仁玕,对他的《资政新篇》不屑一顾,但太平天国许多高级官员都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识,以李秀成为最。

近代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不是始于淮军,而是太平军。李秀成主导成立的洋枪队早于淮军,当时“苏州城中可能有3万支外国枪,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戴步枪和来福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来福枪”。李秀成成立的洋枪队,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人,聘请外国军官以西式军法操练,“在苏州的外国人总计不过120人,不论外国军官或外国士兵都同样受到太平军极好的招待”。<sup>⑤</sup>洋枪队设有“洋炮馆”,负责洋炮的修理及管理事宜。李秀成的军队还拥有缴获的一艘铁甲船,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海军的雏形。李秀成被俘后念念不忘军队近代化,临刑前建议曾国藩往广东购买三四千斤的洋炮、炮架、炮弹和洋枪,由中国匠人仿造。曾国藩以红笔批示:此条可采。<sup>⑥</sup>

除了李秀成重视学习西方文明,太平天国高级将领对引进西方文明十分感兴趣的还有陈玉成、罗大纲等。太平天国攻占镇江,英军舰长费士邦到镇江访问,防守镇江的罗大纲对他表示欢迎。据载,费士邦“得受太平军领袖们的友善的欢迎,称他为兄弟,并告诉他说:将来外国人可以随便使用汽船、铁路、电线及其他西洋机器而无碍”。<sup>⑦</sup>

《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时期没有得到实现,原因是实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始终处于戎马倥偬状态的太平天国缺乏这样一个环境。《资政新篇》问世后仅仅五年,太平天国就失败了,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的蓝图失之交臂。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主张废除中国两千多年来土地和财产私有制,要求平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主张学习西方列强“邦法”,移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与番人并雄”的现代化大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一个面向历史,一个面向未来,尽管两个纲领性文件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但不可否认这是太平天国的伟大创造。

《杂说》没有充分占有大量历史资料,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而不能自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

① 《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86页。

②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7页。

③ 潘旭澜《太平杂说》,第2页。

④ 《天京游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第956页。

⑤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73页。

⑥ 《李秀成亲供手迹》,岳麓书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⑦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简又文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925页。

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sup>①</sup>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事实戳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

## 亦论上帝教不是“邪教”

吴善中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伴随着历史虚无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一股否定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洪秀全的思潮也重返史坛。除了重新掀拾起太平天国破坏论之外,其丑化和否定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太平天国上帝教<sup>②</sup>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太平天国以上帝教起家,又以上帝教立国,可以说,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历史和思想的生命线。对上帝教的认识与理解,关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歪曲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合理性、进步性,就必然会确定上帝教的邪教性质。历史虚无主义者武断地认定上帝教是“邪教”,他们的观点能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

### 一、邪教是一个价值概念

邪教是当今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邪教”这一词汇,已经随着它在世界各地所制造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惨案,成为家喻户晓、老少咸知的名词了。为了更好地治理或打击邪教犯罪,法国、俄罗斯、比利时和中国等国家专门对邪教进行立法打击,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成效。但也有一些国家,如美国,虽然其国内邪教猖獗,其不仅没有就邪教立法,反而对其他国家的邪教立法横加指责,认为是侵犯宗教自由。这固然有政治因素的考量,但也与对邪教概念和本质的认识有关。

依据其是否蕴含是非、明优劣、寓褒贬等价值为标准,概念可分为中性概念和价值概念。邪教不是一个中性概念,而是价值概念。<sup>③</sup>一般认为,一个宗教组织在教义上和行为活动上具有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性性质,即可判定为邪教。而所谓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虽然要基于事实层面的考量,厘清“反”的事实,但其毕竟是人们的一种评价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包含着明显的价值标准。其中,政治标准又往往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判断一种宗教是否是邪教的主要标准。

在中国古代,判断是否“邪教”的话语权掌握在历代统治阶级手中。判断标准主要是政治标准,即是否威胁封建政府统治和统治集团利益。为了有效治理邪教,统治阶级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如《大清律例》。虽然这些法律未明确“邪教”的判定标准,只是规定了较详细的惩治措施,但从大量的“邪教”判例来看,治理目标的重点是放在惩治“邪教”组织的“叛逆”“谋反”等反政府行为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② “上帝会”系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的名称,诸多原始记载均可证实,斑斑可考。过去流行“拜上帝会”说,属以讹传讹。参见夏春涛《“拜上帝会”说再辨正》,《福建论坛》2009年第2期。  
③ 刘正峰、周新国《邪教的法律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上。因为在封建政府看来,倡立邪教,传徒滋事,“非叛逆而情同叛逆者也”。<sup>①</sup>因此规定“除实犯叛逆及纠众戕官、反狱、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案内之亲属仍照律缘坐外,其有人本愚妄书词狂悖,或希图诳骗财物,兴立邪教……比照叛逆及谋叛定罪之案。”<sup>②</sup>即使有的邪教初期少有政治动机,仅仅有一些统治者所认为的“社会危害性”,诸如烧香聚众、夜聚晓散、说经念咒、传徒敛钱等集群聚众行为,也为统治者所不容。例如,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初三河南巡抚何焯在折中说“邪教善于煽惑而易于聚众,外托其劝人为善,而包藏祸心,一遇水旱灾荒,即乘机滋蔓,所以名为邪教,实皆叛逆。”<sup>③</sup>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也被清统治集团定为“邪教”。由于上帝教实脱胎于基督教,所以起初不少清廷人士称上帝教为“天主教”。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痛心疾首地说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表示要誓死捍卫封建的伦理纲常,与太平军决一死战。金田起义期间与太平军作战的姚莹,对上帝教的源流梳理得较切合实际“此次粤贼情形本分二种:一为会匪,乃广东人,习天主教传染而来,其党沿及粤西、湖南、贵州各省,实繁有徒,几于遍地皆是,盖合天主教、青莲、添弟诸会,混而为一。粤西现在名为上帝会……此种匪徒,其心受染已深,牢不可破,最为可恶。”的确,除基督教外,上帝教还有其他源头,上帝教实际上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有机糅合了基督教、粤东粤西的斋教(青莲教)等民间宗教,甚至包括天地会的会党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教门。由于在文化上不认可基督教,并且长期以来,斋教等民间宗教和天地会具有浓烈的反叛行为,所以姚莹认为,新出笼的上帝教“有心为逆”,“最为可恶”。<sup>④</sup>

较早明确称太平天国上帝教为“邪教”的,是曾国藩的幕僚张德坚。秉承曾国藩旨意,张德坚等人早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就编纂成《贼情汇纂》,其中专门列有“贼教”卷。曾国藩、张德坚认定上帝教是“邪教”:

自古草窃之徒,多借邪教以倡乱。自季汉张角之后,如宋贝州妖人王则,明蒲台妖妇唐赛儿,近之白莲教、八卦教,莫不假托鬼神,煽惑愚民,以为渊丛之聚。逮人众势炽,以威胁人,或不专恃其教,可知邪教实为乱阶。……若今之粤匪则大不然,初或借邪教为倡乱之资,既寓诡计于邪教之中,更逞其私智,懈我将帅,惊我兵士,惑我人民。<sup>⑤</sup>

与判定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宗教是“邪教”一样,统治者定太平天国上帝教为邪教,从根本上说,是其政治立场决定的。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捍卫封建伦理纲常,就必须镇压惩治一切“谋逆”“谋反”的反叛意识和行为。即使一些温和的“吃斋念经”“运气打坐”“做会度亡”等宗教活动,由于可能存在集群聚众行为,也被视为潜在性的破坏统治秩序、危及统治政权,从而被认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当然,“邪教”是一个价值概念,除了体现在它是统治阶级基于政治立场而使用的概念,因而是一种价值评价外,更体现在正统或自视为正统的宗教对一些非正统宗教(新兴宗教)的攻讦上。据学者

① 薛允升《读例存疑》卷25,“刑律贼盗上”,清光绪刊本,第5页。

② 薛允升《读例存疑》卷25,“刑律贼盗上”,第4页。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7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版,第121—124页。

④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4页。文中“天地”被避改为“添弟”。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研究,中文语境中“邪教”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后秦时期僧人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经》。约公元一二世纪,从部派佛教中析出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贬斥原始佛教及其他佛教宗派为“邪教”。<sup>①</sup>这里“邪教”的“邪”,是“不正”的意思,“邪教”即是“旁门左道”“野狐禅”。我们从历史上各宗教派别的“正”“邪”纷争中,更可以看出邪教概念的价值属性。

邪教概念的价值属性,决定了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政权、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观。“在某一个文化体系中属于‘正教’的宗教,到了另一个不同质的文化体系中,有可能被视作‘邪教’,如在近代中国,西方来华基督教就曾与中华本土宗教(儒、佛、道等)互视为邪教;被某个阶级奉为‘正教’的,有可能被另一个敌对的阶级视为‘邪教’,如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奉拜上帝教为‘正教’,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则斥之为‘邪教’”。<sup>②</sup>判断一个宗教或自称宗教的组织是否属邪教,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判断主体的阶级属性及其所认定的该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

## 二、上帝教“邪教”说驳议

历史现象总是在惊人地重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与清朝统治阶级隔空呼应,学界竟然又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上帝教为“邪教”。

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潘旭澜著《太平杂说》,较早推出洪秀全是“邪教主”的说法。他说“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洪秀全的‘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渣滓为主,掺和少许外来文化的荒诞因素,完全按照个人需要制造出来……建造地上的天堂……让他自己统治和占有天下。可见它是建立超级奴隶主王朝的邪教的基本理念”。<sup>③</sup>《太平杂说》是一本杂记、随笔类的短篇杂文集。对于为什么说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限于文体和学识,他并没有展开论证,只是信口开河、随意发挥而已。倒是太平天国史专家史式发表《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sup>④</sup>对照他所认为的正统宗教和“邪教”区别标准,认为上帝教是“邪教”。史式认为衡量“邪教”标准有以下5点:1.“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2.“邪教都会装神扮鬼”;3.“邪教都需要敛财”;4.“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5.“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作者信誓旦旦地宣称“以这5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上帝教)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sup>⑤</sup>

在这里,史式自己订立了判断“邪教”的五条标准。在史式看来,似乎符合这五条,就可判断为“邪教”了。我们这里暂不讨论邪教与正统宗教的主要异同点、不同时代邪教“犯罪”的认定及其构成要件,能否脱离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仅以这五条抽象标准来讨论上帝教就是邪教等问题,仅从事实辨正和事实评价的角度,分析史先生的观点。

说“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这是从教义上来区分

① 刘正峰、周新国《邪教的法律治理》,第11页。

② 蔡少卿、孔祥涛《试论当代邪教的几个特点》,《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③ 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18—219页。

④ 后文所引史式说法均见该文。

⑤ 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为金田起义150周年而作》,《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正统宗教与邪教。夏春涛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精辟指出,“上帝”“魔鬼”“天堂”“地狱”这四个概念构成上帝教教义的中心环节。其中,“上帝”是上帝教的核心概念,敬拜上帝为“独一真神”是上帝教的最基本教义;而“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一切异教邪神,阎罗妖、蛇魔、东海龙妖都是“魔鬼”;“天堂”“地狱”则是上帝赏善罚恶的场所。<sup>①</sup>史式说“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是在指责“天堂”“地狱”等上帝赏善罚恶场所的邪教性。

上帝教宣扬的“世界末日”,信奉上帝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并不是用来“吓人”、骗人的,而是渊源有自。

上帝教的“天堂”“地狱”及“世界末日”等概念来源于基督教。学者早就指出“基督教告诉人们说,天堂、地狱分别是上帝赏善罚恶的场所……上帝教也以天堂、地狱作为上帝实施赏罚的场所,但评判的标准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种,凡拜邪神、行邪事、与太平天国为敌者将坠入地狱,反之,则升入天堂。此外,上帝教沿袭了基督教天堂永福、地狱永苦的说法。至于天堂、地狱的具体景象,上帝教也直接从基督教吸收了一些素材。”<sup>②</sup>上帝教当然也吸收了基督教“世界末日”“末日审判”的说法。依照基督教说法,基督复临时,要对那些不拜上帝、冥顽不化的世人施加空前灾难,进行“末日审判”,将他们丢入燃烧着火、硫磺的“火湖”,永远受罚。洪秀全借用了这些说法,其《天父诗》第271首:“草对弯弯直上天,不对走下永火湖”;第490首“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sup>③</sup>

当然,上帝教“天堂”“地狱”观及“世界末日”的说法,不仅仅是源自基督教,中国传统佛教的“极乐世界”“十八层地狱”和道教的“神仙天界”“阴曹地府”,以及佛道两教的“劫变”“劫数”等观念对其也有影响。

“天堂”“地狱”“世界末日”和“劫变”等观念,不仅存在于基督教、佛教等正统宗教的教义中,同时也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中,不能将其作为判定正统宗教、邪教的标准。

史式又说“邪教都会装神扮鬼”“邪教都需要敛财”“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这是从宗教行为上来分辨正统宗教和邪教。他指斥上帝教“装神扮鬼”主要是针对1837年洪秀全“天西异梦”和1848年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而言的。对“代天父天兄传言”,过去学者们均认为是受到了广西民间“降僮”巫习的影响;对洪秀全的“异梦”,我们早年曾认为其中“处处透出了道教的色彩”,认为只有多年受到传统道教的浸淫,洪秀全才能做出这么一个梦。<sup>④</sup>近年,基督教史专家周伟驰认为,“天父天兄下凡”源于洪秀全“自行解经(圣经)”,从圣经中都得到了什么根据来判断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言行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并且,通过对基督教、上帝教经典的文本对勘,周伟驰认为“先知传言”“神灵附体”“战妖”“赶鬼”“超升”“升天”“异梦”“异象”等内容,“在基督教当中本来就有。从基督教内部逻辑来看,上帝教的这些因素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sup>⑤</sup>的确,作为一种不先进不科学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基督教和上帝教,世界上任何宗教不可能不包含迷信和异端、妖魔和鬼怪,都会有一些装神扮鬼、神人交通的宗教行为,区别只在于时代不同、手段不一、程度差

①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②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96页。

③ 周志初、华国樑、吴善中《太平天国与道教》,《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470、498页。

⑤ 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



异。关键在于,神人交通、装神扮鬼的迷信行为,其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其社会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邪教都需要敛财”,以“敛财”为标准区分正统宗教与邪教,也是有问题的。“敛”科敛也,带有贬义。史式先生说正统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经费,否则无法发展”。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自筹经费”就是邪教行为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其实,正统宗教也好,邪教也好,为了保证宗教组织的运行、宗教活动的开展,都需要有经费保障。正统宗教的“公开募化”,不就是“自筹经费”吗?问题不在于经费的来源渠道,而在于筹集经费的手段和目的。史式还指责太平天国“入(拜上帝)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的圣库制度,实际上,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圣库制度是洪秀全“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社会宗教理论的逻辑发展,“废除私有财产,平均分配生活用品的圣库制度,严申一切战利品缴归圣库,严禁私藏金银财物,从而吸引了大量无衣无食者投身起义,并在维护军纪、保障供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sup>①</sup>说洪秀全等领导人通过圣库制度达了个人“敛财”目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与其他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者一样,潘旭澜《太平杂记》、史式《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等论著总是乐于以天王洪秀全的所谓宫闱秘事说事。史式认定洪秀全是一位“淫棍”,并以此作为判定上帝教是邪教的根据。作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的家庭、宫闱生活确实有值得非议之处。例如,从金田起义起,他就拥有众多嫔妃,为人脾气暴烈经常打骂嫔妃,这些自有事实根据。但世间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太平天国宫闱秘事,均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低级趣味,哗众取宠,其中有不少捏造、污蔑成分。记载太平天国宫闱秘事较多的笔记、杂录,如汪堃《盾鼻随闻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早被罗尔纲先生判定为“伪书”;即使如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有关这方面相应记载也多有夸大、渲染。使用这些材料要谨慎。太平天国出版的《天父诗》500首,是天王宫廷嫔妃们的“教科书”,多涉及太平天国宫闱制度、天王的宫闱生活。老一辈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吴良祚先生指出“我们从《天父诗》所反映的天王私生活,可知洪秀全一方面学起封建帝王的臭架子,选了这么多妃嫔来服侍他,表现了一定的享乐思想和落后性;但清方记载极言丑诋他私生活如何纵欲腐化……却是彻头彻尾的污蔑,是没有根据的。”<sup>②</sup>

史式还套用现代邪教对教徒的人身控制来否定上帝教,说“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说太平天国“全民皆兵”、《十款天条》作为军律是一种“人身控制”因而是邪教,这倒是史式的一个空前“创见”。作为一支有明确推翻清朝统治政治目的的军队,太平军采取全家全村入教、全家全村入伍这一“全民皆兵”军队组织方式,既是形势所然,又是战事所逼。太平天国实行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组织体制,太平军既是军队组织,又是宗教团体,“全民皆兵”、《十款天条》作为军律之一,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它们都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而非“人身控制”。

史式的以上五点论证,破绽颇多。问题关键还不在此。研究邪教,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要历史、辨证地看问题,不能片面、孤立地就宗教而研究宗教,而要把宗教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综合分析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否则,孤立、抽象地列出与当代邪教几个相似点来随意比附的话,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可能被误判为邪教。

①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448页。

② 吴良祚《关于“天父诗”》,《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

### 三、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农民自己的宗教

太平天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兴盛与衰败，与上帝教有莫大关系。

在前期，洪秀全通过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树立起斗争的旗帜，确立了打击目标，描绘了天国的愿景。在凝聚人心、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方面，上帝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催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恩格斯谈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时指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sup>①</sup>这同样适合于中国。洪秀全等人撷取基督教的主要教义，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的独到体验，创立了上帝教。起初，上帝教以“异教的形式出现”，是一种温和的救世的宗教，试图以道德说教的手段来拯救世风日下的人心世道。但两广地区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使得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逐渐确立了反清志向，相应地，流布于该地区的上帝教革命色彩日渐浓厚，最终“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

上帝教为太平天国确立了革命对象与革命目标。革命对象就是上帝的对立面——“魔鬼”。宗教层面的“魔鬼”主要指上帝以外的一切邪神偶像；政治层面的“魔鬼”，就是活着的“生妖”，其头子是清咸丰皇帝，也包括那些不敬上帝的“妖徒鬼卒”——即清各级官员和士兵。革命目标是横扫“罪地”（北京），推翻清朝统治。

上帝教还为广大太平军将士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天堂愿景。上帝教的天堂观原本出于基督教，但洪秀全等人对之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提出了“上到小天堂”的口号。基督教的“天堂”，《圣经》中多处言及，以洪秀全早就熟读的《圣人约翰天启之书》（今译《启示录》）为例，其第21章说“当时我看新天新地，因初之天与初之地过去，后未有海，太平矣。我约翰看见圣城新也路撒冷，自上帝来，由天而降，齐备如新娘修饰为丈夫也。我闻天上大声云：‘上帝之堂今在人间。且上帝偕之住，其将为其民；然上帝偕之在，而为其上帝也。上帝将拭去诸目泪，并无死亡、忧闷、泣哭、疼痛，因先事已过矣。’”基督教的这个“天堂”就是耶稣复临时重建的“上帝的国”。出于构建上帝教教义的需要（也有误读误解因素），洪秀全将之搬到了天京。洪秀全在这段话旁批曰“在地如在天，约翰所见是天上大天堂，天上地下一样。新也路撒冷，今天京是。上帝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作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今在人间，验矣。”<sup>②</sup>将基督教所言的“天堂”，当作了天上的“大天堂”；而将天京称作地上的“小天堂”，即“天朝天堂”，是人间的美好天堂。

“上到小天堂”，金田起义前后就成为宣传动员村民参加太平军的口号。洪秀全在1851年颁布的几通《天王诏旨》中一再承诺“同见小天堂威风”“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sup>③</sup>这帖兴奋剂颇见成效。谭熙龄《紫荆事略》记紫荆山区人们“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或问其故，则曰：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页。

②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2页。

女耶?闻者叹其狂……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sup>①</sup>上帝教的“小天堂”口号凝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激发了将士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从而使太平军过关斩将,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直下天京。

但宗教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是精神鸦片。宗教可以宣传革命、鼓动革命,催生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终究会成为革命运动的“催命符”。定都天京以后,上帝教开始成为统治者谋取特权的工具。“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杨秀清,利用“传言”权力处罚部属,折辱天王。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原因之一就是太平天国特殊的教权、政权结构。天京事变后,天京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民谣,这几乎宣告上帝教的破产。

洪秀全等人通过上帝教,演了一出太平天国天上人间的悲喜剧。“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接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sup>②</sup>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农民自创的宗教,它符合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农民群众自己的宗教。只要承认太平天国运动的必然性、合理性,也就必须认可上帝教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不可否认,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宗教,其中不免充斥着迷信和落后的说教,但这些也为其他宗教所共有。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政治理想的宗教,它不是邪教。

##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

顾建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引起了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的巨大变革。在其早期传播过程中,学者们即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由此打开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路径,促进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这一转型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的史事和人物具有重要意义,但对这一转型,学术界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本文不揣浅陋,试对此进行探究。

###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概述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西方先进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后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并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其传播历程经历了从介绍、摘译的零星传播到全译、全集的系统传播。中国人撰著的系统研究论著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完成。

清末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即已出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容。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节译介绍《共产党宣言》。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文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过多篇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庚子事变后的留日学生则以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底本,向国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4463页。

<sup>②</sup>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劳工的力量。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劳工运动的重视。他认为,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一切历史上残余的东西,比如皇帝、贵族、军阀、官僚、资本主义等,预言“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sup>①</sup>1919年7—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述人民群众的作用,提出由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发展到民众的大联合以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策略思想。

列宁著作也随十月革命被介绍到中国。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第一号刊登《列宁的历史》《为列宁》《列宁的著作一览表》,集中介绍列宁及其重要著作。列宁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这一论断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传播时多以转引节译的形式出现。例如,陈溥贤翻译了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连载在1919年5月5—8日的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上。该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19年12月,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节译了《神圣家族》等八部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恩格斯两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当时节译最全的版本。

随着传播的深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开始出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加强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研究著作,中文全译本成为主要传播形式。如1929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杨贤江译,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哲学的贫困》(杜竹君译,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1930—1932年,《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陆续出版。<sup>②</sup>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教材也大量翻译出版。如1932年9月,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sup>③</sup>出版,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21年,陈独秀、李达创立人民出版社时,曾计划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但直到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

除了介绍经典著作,传播者们也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学说是“时代的产物”,“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sup>④</sup>施存统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不必拘泥“枝叶政策”。<sup>⑤</sup>

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1926年,李达在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性质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前途等重大现实问题。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进行划分,分析了各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在革命中可能的态度,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同盟军和领导者,强调内外环境的变化会导致阶级群体的分化,应适时地调整政策,以取得革命的最终成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5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分册),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篇(第2、3分册),潘东周译,北平东亚书局1932、1933年版。

③ 西洛可夫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

④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⑤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

功。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共产党人对待农民运动应站在前头领导,而不是在后面指手画脚地批评,更不是站在对立面反对。

1937年,李达《社会学大纲》出版,<sup>①</sup>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完成。该书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理论上的发挥和超越,如认为“未来的新社会中,生产力、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虽都是平等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sup>②</sup>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和任务,理论界随后开展了一场“学术中国化”的讨论。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毛泽东思想由初步形成走向成熟,有力指引了中国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

## 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学习、接受和运用的过程。同样,以唯物史观指导太平天国史研究,也有一个学习、接受和运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立即自愿地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民族史观指导时期、民族史观和唯物史观并存时期、唯物史观指导时期。

唯物史观未应用于历史研究之前,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盛行考据,对历史的解释则以王朝正统史观为主。清末反满和变革封建统治的要求使得历史书写也出现了变化。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于1901年和1902年分别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系列文章,提出资产阶级“新史学”,反对正统论,提倡国史、民史;清末革命党人为反清排满需要,抨击成王败寇说,宣扬民族革命史观,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归因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压迫统治,称太平天国运动是抵抗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太平天国将士是“英雄”“先烈”。清末流传很广的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和黄世仲《洪秀全演义》皆从这一角度进行书写。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清末革命党对太平天国性质的解释成为民国官方主流论调。这一时期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书籍也秉持这一史观。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上海文明书局1923年版)是在抄本《洪杨纪事》的基础上增删而成,而《洪杨纪事》又据张德坚《贼情汇纂》编撰。《太平天国野史》全书共20卷,将抄本中对太平天国的蔑称一概删改,如将“首逆伪天王洪秀全”改为“本纪”,“贼文告”改为“文告”,“伪文字”改为“文字”,“篡窃”改为“革命”等。李法章《太平天国志》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在“自叙”中,作者誓革成王败寇之“陋习”,坚守反满兴汉的民族革命立场。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同样抨击成王败寇说,将太平天国的起事原因解释为“客帝临朝”,“盗憎”“中原故族”。<sup>③</sup>

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开始尝试用其指导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最早从李大钊开始。1920年,李大钊发表文章认为唯物史观之前的历史解释都是唯心史学,为权势阶级服务;将历史发展归结于“天意所存”而忽视“人力所造”,这种做法是“陈腐而且陋劣”的;唯物史观传播后,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受影响,而“热心

① 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② 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论》,宋俭、宋镜明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达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③ 李法章《太平天国志》,华新书社1923年版,第140页;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sup>①</sup>

1924年9月3日,中共主办、在上海创刊的《向导》周报刊登四篇义和团专题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一致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由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其中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将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相比较,认为“洪杨李秀成等皆耻求助于外人——侵略者,正是洪杨革命的卓越”。这大概是首次以唯物史观评价太平天国。1926年,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指出,太平天国不是满汉战争,而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sup>②</sup>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指导理论开始呈现民族革命史观和唯物史观并存的局面。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史,国外学者早于国内。因此,国内学者运用唯物史观撰写太平天国史论著时,难免受到国外论著的影响。据学者研究,李一尘和张霄鸣的太平天国史论著都受到波兰学者拉狄克(Karl Radek)《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尤其张霄鸣一书所受影响更大。<sup>③</sup>

1930年,李一尘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该书多引用外文书籍中的相关论述,从经济方面分析了太平天国发生的时代背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一种革命来改变生产关系,以加速生产力之前进”;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是汉人与满人的冲突、民众与政府冲突的表现,外交的失败加重了这种冲突;认为分析19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及社会制度能得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析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及社会制度也能得出目前的中国革命运动。该书批评了对于太平天国的两种评价,一是认为太平天国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骚动,仿佛……一种暴乱抢杀行为”;二是“歌颂太平天国的功德,或者是以英雄伟人看待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作者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带着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农民革命”,其伟大在于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消灭地主私有土地,其土地政策是军事土地共产主义。该书根据经济状况将对立双方分成两大营垒:革命营垒以破产农民、贫苦绅士为主,农民“是被封建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官僚的三角联盟”压迫剥削的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反革命营垒以将死亡的满洲政府、官吏、地主、商人、富绅为主。该书又将绅士分成三个营垒:革命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消沉者、反革命者;认为革命失败源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压迫。<sup>④</sup>

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的体例、结构、观点与李一尘著作大同小异,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分析两大营垒时,反对将各营垒固定不变的机械论,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各营垒中阶级阶层的纷争变动;将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七条,如“没有中坚有力的领导阶级”“没有密切的联系全国革命力量”“没有急速的颠覆反革命的中心势力”“革命队伍中之内讧”“帝国主义帮助地主和商人向革命进攻”等。最后号召“革命的战士们”完成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尤其是土地问题”,但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去解决,不能实行“原始经济的农村公社的共产制度”。<sup>⑤</sup>

李一尘和张霄鸣都以专门篇幅论述“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强调太平天国的反满政策,但全篇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经济角度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敌对双方的阶级成分、政策制度和失败原因,虽因资料局限,有史实错误,但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唯物史观的窗,

①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③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7页;李孝迁《拉狄克与中国左派史学》,《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④ 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大光书局1930年版,第63—77、2—4、131—138、104、88页。

⑤ 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5、270—271页。

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用语如“没有中坚有力的领导阶级”也常被后来论著借鉴。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其太平天国内容多参考张霄鸣之作。

此后,受抗战影响,以唯物史观解释太平天国史的论著不断出版,特别是在延安、抗战后方和上海公共租界。如1937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上海真理出版社出版了李群杰的《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1944年上海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了朱谦之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1945年4月25—3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连载了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同时,坚持民族革命史观的论著也一直存在。以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和萧一山的《清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最为典型。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主导地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潮流和必需。通过学习,学者们的认识逐渐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反唯物史观遭到批判,单纯的民族革命史观遭到摒弃。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至此才最终完成。

### 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史引起的争论

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新理论研究太平天国史,不可避免会引起争论。争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方法论之争,二是支持何种抗战建国的道路之争。

李一尘和张霄鸣等人的论著,被批为只重理论,不重史料,是“绝无确凿的和充分的事实为根据的空论”,因其引用原始资料较少,多采用国内外论著中的论述支持自己的观点。李群杰支持李一尘、张霄鸣,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一书中,开宗明义声明自己“是以研究‘理论’为主标的……谋理论与实践之一致”,认为“研究运动史而抹煞它领导运动的理论,是盲目的史家……我本着为学术而努力的坚定信念,奋力前进,务给妄断天国革命运动为‘盲目蠢动’者以事实的答覆”。<sup>①</sup>他们被称为史观派。

因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同,学者各自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李一尘、张霄鸣认为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认为是“接受了资本主义影响的反封建剥削的革命运动”,是“根本企图改造政治制度之民主主义政治运动”,不是“反对满清的狭义民族主义运动”;叶青认为是“市民性的农民革命或农民性的市民革命”;朱谦之认为是“农民之土地共产革命”“民族之政治制度革命”“宗教之文化教育革命”。<sup>②</sup>这些争论终未达成共识。因缺乏对唯物史观的准确把握,更缺少对太平天国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系统研究,这些争论多为概念之争,对研究和理解中国近代史作用有限。一种社会形态,其内部各种因素的发展并非整齐划一,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发展也不平衡,所以,只抓住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就断定太平天国的性质,显然不够客观全面。

罗尔纲师事胡适,注重对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订。在《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自序中,他评价道,“最近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又多成为一种理论的解释,内容无无故实,迹有近于宣传”;历史家的任务是“求真”“传信”,不要为“时代的观念”所持。简又文支持罗尔纲所

<sup>①</sup> 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上海真理出版社1937年版,第5页。

<sup>②</sup> 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第18、90—91页;叶青《序言》,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第2页;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中华正气出版社1944年版,第68、91、123页。

论,认为史观派“无非是师前辈革命党人之故智——借题发挥,以太平史为煽动的工具”。<sup>①</sup> 萧一山、谢兴尧等人也强调史料,注重考证。他们被称为史料派。

朱谦之主张两派取长补短,认为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两者缺一不可”。要注意史料之解释,但“只知道有史料的解释,而不知从事史料的搜集、直接应用原始材料”,是“迁就事实,来完成空洞的理论”。<sup>②</sup> 他在撰写《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时,即力求将史料和史观相结合。他还力赞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是二者并重。

关于支持何种抗战建国的道路之争,尽管争辩双方都承认太平天国是反满的民族革命,都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进步,但谁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个人、英雄,还是人民?这根本上是如何看待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抗战后国共两党以何种“主义”建国的道路选择。

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洪氏侥幸成功,不过以暴易暴,而其狂妄之思想,摧残文化,祸犹未可知也”;所谓“太平天国实行共产,其言殊不确实”,“其人殆共人产,而不与人共产也”;“二十四年中之悲惨战史,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蒋廷黻认为太平天国仍是“旧社会走循环套”,其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他们都肯定曾国藩等人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以古论今,对于抗战建国的道路选择,陈恭禄认为,不管是以武力还是独裁,当下急务是将“中央权力达于各省”。蒋廷黻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追随总裁,谨守总理遗教,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sup>③</sup>

简又文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人口过剩、土地集中、帝国主义侵略来解释太平天国起因,都没有根据,李一尘等人的著作是“无根据的空论”,太平军与湘军的战争是“农民打农民”,太平军的“破坏力及毁灭力”“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他主张“生命中心说”,赞同“民生史观”。<sup>④</sup>

李群杰反对称太平天国“盲目蠢动”,认为“市井上虽然有些搜集在教本里的太平‘信’史,但十九是虚伪的”,所指即为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革命史》《中华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等书。他力证太平天国运动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比其他农民起义进步,上帝会“内在”的革命性,比从前任何秘密会社都进步,政治旗帜也比任何一次运动都鲜明。范文澜驳斥了蒋廷黻的“循环套”论,认为自“太平革命”揭开了“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这个革命起了“民主革命先驱者”的作用,而曾国藩是“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sup>⑤</sup> 该书运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语体系,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主张。

以上这些分歧其实是唯物史观在传播过程中与其他思潮的论战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史料派与史观派之争,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子。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异议,推行其实用主义哲学。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认为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

①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17页。

② 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朱谦之序”,第1页。

③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55、188页;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91页;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青年书局1939年版,第54、125、141页。

④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5、15—18页。

⑤ 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第10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73、143、392页。



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sup>①</sup> 在现实中,要根本解决一切问题,必须用阶级斗争学说去联合工人运动。经过激烈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最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而史学界对于史料和史观应该结合运用,最终也不再争议。

从梁启超批判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史,到进步知识分子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再到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从历史理论到革命实践,民众力量都得到了空前重视。抗战建国的“主义”之争,其实是要不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之争,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之争,是唯物史观传播过程中“社会主义论战”的反映。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能开发实业,增强富力,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梁启超为之声援,认为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应先有资本阶级,再有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才有凭借。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认为中国“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实行“平民专政”,可将“散漫”资本“强制搜集起来”大办实业;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很多游手好闲之人,若实行“不工作者不得面包”,必能成为有用的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掣肘实业”的强大的官僚势力。张东荪、梁启超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则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李达认为在中国“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陈独秀强调,中国不能实行“欧美已产生危机的资本主义”,“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危及不独立”。这次社会主义论战让“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鲜明地“各为其主”。<sup>②</sup> 在史学领域,这“两派”的对立也表现得很明显,对太平天国的不同评价就是现实态度的真实反映。

其他论调,如主张“民生史观”,主张人性论、反对阶级斗争等,在戴季陶主义中都有体现。讲求民生有其积极意义,但戴季陶主义不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模糊阶级界限,纯粹从生物学观点谈人类生存,完全无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抽象地强调人性至上,最终走向唯心主义。湘军和太平军本质上确实都是农民,但因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阵营,使得他们自身也被赋予了不同的阶级利益色彩,士农工商兵等职业人群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属性。因此,抛开阶级利益谈抽象的“农民打农民”,无视阶级属性谈抽象的职业归属,都是唯心论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争论过程中,持唯物史观的学者为了反驳对手,证明太平天国运动比历史上的其他农民起义进步,对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常有不同程度的美化,对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 余 论

在唯物史观传播过程中,革命与改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止。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尽管在历次论战中都败北,但

<sup>①</sup>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sup>②</sup>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宋俭、宋镜明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达卷》,第35、24页;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时候还会沉渣泛起。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波动,出现了否定甚至妖魔化太平天国的声音。比如,说太平天国运动除了破坏还是破坏,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太平军与湘军的战争是神权与人权之战,等等。这些言论背后的主张其实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论调在唯物史观面前,根本不值一驳,但因其引起思想混乱,又不得不驳。1990年,朱东安发表《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从理论、论证和史实等方面对“神权政治”说进行批驳。文章认为,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封建剥削以及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太平天国和曾国藩代表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太平天国不是要推行神权政治,而是要中国独立富强。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指出了什么方向,比前人增加了什么新内容,给后人以什么启示。2002年,夏春涛发表《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强调不能沿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将“邪教”视为历史上民间秘密宗教的代名词。太平天国领导者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借宗教起事,无可厚非,不能否定其正义性,也不能以后世眼光苛求前人。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有其成功、积极的一面。<sup>①</sup>

像唯物史观在传播过程中常常遭遇质疑、反对一样,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以非唯物史观解释太平天国的论调也会反复出现。学者只要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去辨析,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会为错误思潮所迷惑。

## 太平军军纪再审\*

刘 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太平军的军纪优劣,影响民心向背和战争成败,关系战争问责和太平天国评价等重要问题。面对史料中俯拾皆是的负面描述,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历史现象的复杂面相,抛开“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历史窠臼,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走出全面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学术怪圈,理性地审视太平军的军纪。

### 一、《江南铁泪图》所绘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无锡绅士余治离乡避难,感江南难民流离之苦,将沿途见闻绘图辑成《江南铁泪图》,并赴江北劝赈募捐,其中有两幅图反映了太平军军纪之败坏。<sup>②</sup>

图1原书注云“贼拥众自卫,到处掳人,以麻绳穿辫发,如鱼贯然,牵连以走,逃逸无从;不能走

① 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群体性事件与官方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CZS038)的阶段性成果。

② 《江南铁泪图》始刻于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苏州宝文斋刻字铺重刊。本文所录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重刻本。《江南铁泪图》是当时人据当时事绘当时景,为现存鲜见系统的战时图像资料。“铁泪图”之称,据余治自释“江南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剧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该书收录的42幅图形象系统地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以及战时江南社会和民众生活的一般状况。

及不肯走者均遭惨死,而更甚者乘黑夜睡梦中来,谓之“摸黑”,一一捉去,更无可逃。”“摸黑”一说确有其事,乃客家俗语,孙鼎烈记无锡事“逾年,贼途径渐习,每昏黑四出掩袭,谓之摸黑。”<sup>①</sup>“以麻绳穿辫发”也有类似记载“贼虏人不论多少,或五六人,或七八人,必以各人之辫发作一束,使前行,不走则杀却。”<sup>②</sup>

图2反映了太平天国以“贡役”制[即向民众“征贡”和太平军“打先锋”(掳掠“派大捐”)]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从图绘内容看,船上进贡乡民尚有喜悦之情,乡官局门口有太平军拱手出迎(实际不合太平天国礼制,太平军视拱手作揖磕头为妖礼),形容和蔼,并非剑拔弩张。归庆柟《让斋诗稿》“诗注”也记“出视伪示,虽云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名为安民,其实在每都每图有献,即不抄扰也。前日入城进物,一概全收……留吃饭而出。”<sup>③</sup>这是民众对太平天国贡役政治主动响应的一面。



图1 掳入入伙密布天锣<sup>④</sup>



图2 逼勒贡献丑类诛求<sup>⑤</sup>

《江南铁泪图》与太平天国同时期,劝捐区域又是与江南仅一江之隔的江北,社会现状为当时人共睹,绘述内容须有基本如实之原则,否则便失去宣传的可信度。但因作者立场敌视太平天国及著书目的是“劝济江南难民”,所绘场景必有丑化太平军和过分渲染以博取世人同情之处,尚需观者甄别。

前举二图均意在反映太平军军纪败坏,其中呈现的太平军形象却有所不同。那么,太平军的军纪实态到底如何?

## 二、军纪流变

太平军的军事纪律有明确的文本规定,如前期颁行的《行营规矩》《行军总要》;现存太平天国安民布告几乎均包含宣明军纪的内容。可见严明军纪的原则是始终如一的。太平军的军纪实态却表现为两类截然不同的军事实践:一是军纪严明,深得民众拥戴;一是军纪败坏,“打先锋”“掳人”“屠

① 孙鼎烈《纪粤寇难》,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② 范其骏《庚申稷湖被难日记》,《补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 归庆柟《让斋诗稿·九月杂咏》抄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第39页。

④ 余治(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新编》,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第4页b—5页a。

⑤ 余治(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新编》,第15页b—16页a。

灭”等行为增多,引起民众敌视,引发民众反抗。

但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是,太平军的军纪实态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地域差异和主政将领的个体差异。

太平军军纪下滑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即1860年(咸丰十年)前的军纪优于1860年后。1860年之后太平军军纪实态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862年(同治元年)春夏为界。沈梓《避寇日记》记同治元年七月有自太平军中逃出的“士兵”口述“贼号令故严,有不如令者率梟首示众,故兵符发兵者,克期辰刻,则寅刻必至。余在贼所二年所见皆然,今则不尔矣。调兵失期者,或一日二日三日不等,甚有屡调不至者,营门斩首累累,而逃亡失期如故。以是知贼势已去,大约无厌之矣。”结合同年五月嘉兴秀才江梦兰对时局的阐述——“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尽可做得;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sup>①</sup>——可发现太平军军纪优劣与战局顺逆密切相关,1862年后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军队违纪现象愈加突出。

从主政将领和地域差别看,在陈玉成、李秀成等主力部队,以及他们能够直接掌控的辖区内,仍然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军纪。由于李秀成等重视与民休息,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主要由李秀成部将据守的苏南地区,驻守太平军的军纪就比浙江李世贤、皖南杨辅清等部好得多。

太平军军纪实态的阶段差异与太平军的扩招有关。后期有大量散兵游勇、枪船民团、无赖游民加入太平军,仅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手下就有百万之众。《避寇日记》称“盖贼兵甚众,伪天王兵调齐共八百万,即嘉兴伪听王兵亦有百万,与官军实众寡不敌也”。<sup>②</sup>数字可能言过其实,但后期太平军数量激增是事实。太平军还直接收编了部分天地会队伍为“花旗军”,还有台州“十八党”、诸暨“莲蓬党”、余姚“十八局”等。这些新兵纪律松懈,不服管束,常有烧杀掳掠之事。文人方芬记录了两广花旗军在浙江金华自相攻杀而殃及无辜百姓的场景“雀鼠争雄未肯降,五花旗帜舞猖狂。频驱士女充军数,尽废田园作战场。两广锋交黄石岭,八方火起白沙庄。村墟寥落成乌有,一望无垠百里长。”<sup>③</sup>

这么多的兵员,一是掳人所得,一是招兵所得。被掳士兵军纪自难保证,招募的士兵心态也具有投机性,“其志在子女、玉帛、酒食、鸦片者无论矣”。台州6县投太平军者多达13万人,其中太平县有万余人,他们加入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动机是维系生活,“非真乐为贼用也,惟欲掠取财物,乘间逃回耳”。<sup>④</sup>在秀水陡门,有一太平军士兵在饭馆中谈论太平军衣食不足“长毛做不得,不如行乞。我从头子在杭打仗一月矣,不曾吃得一顿饱饭,至今日方得果腹,且又死生不测。”<sup>⑤</sup>主动投入太平军的人大多抱着“当兵吃粮”心态,而技能、纪律极差,加之太平军将领疏于管教,“新兄弟”的作风极难靠自觉性得到优化。

当然,后期太平军数量暴增制约了军纪的约束力,太平军将领的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愈至时局艰难,太平军将领严明军纪的主观意志也愈会松懈。尽管“打太平先锋”<sup>⑥</sup>和“私打打贡”的行为

①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40页。

②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141页。

③ 方芬《书诗志恨六十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7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④ 叶蒸云《辛壬寇纪》,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372页。

⑤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73页。

⑥ “打过先锋地方复至劫掠,贼谓打太平先锋”,参见廖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太平先锋”的另一种解释是只征集军用物资而不打仗,曾含章《避难记略》载“贼之焚杀掳掠曰打先锋。不杀人放火,而但掳物,曰太平先锋。每以此胁人,谓钱粮不清,将打先锋也。”参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342页。

受到太平天国法令的限制,普遍征兵制也因“募兵”“招兵”方式的运用被弱化,但此类违纪行为始终存在。仅靠良性施政者的主观作为约束军纪,短期内难以奏效,很难消弭太平军与民众间的隔阂。如果一支军队的军纪单纯倚靠统军将领的宽严之策维系,缺乏完善系统的教育、训练和奖惩规制,那它表现出差异性并不令人意外,而决定太平军前后军纪形态差异的根源在于后期太平天国各自为政、立政无章的涣散政局。<sup>①</sup>

太平军的军纪问题是太平天国军政当局处理、改善与民众关系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太平天国没能成功组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如一的军队,这是它作为旧式农民起义的严重局限,也是历代农民起义军共有的现象。

### 三、兵燹之责

在评价太平军军纪时,既要正视其军纪的不良表现,同时也要看到太平军军纪实态有它积极的一面。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太平军军纪,才能得出公允的结论,区分兵燹之责。

#### (一) 太平军有严明军纪的主观意识和实际行动

以补充兵源一事为例,太平军在习惯性掳人的同时,也坚守募兵制。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T. T. Meadows)观察到“太平军早已放弃他们在1853年实行的普遍征兵制,此举曾引发民众对太平军到来的恐慌,现今他们以自愿从军的方式来补充太平军的战斗力量。”<sup>②</sup>1854年,太平军在安庆等地招募乡勇,“其乱民从者甚多”。<sup>③</sup>1861年,李秀成在湖北“招兵”,一次即得30万人。<sup>④</sup>林大椿《粤寇纪事诗》有《招兄弟》一首,注明“贼目下乡招兵,择其无室家者则纳之”。<sup>⑤</sup>贯穿太平天国始终的掳人现象实是早期普遍征兵制的贻害,但太平天国在原则上奉行募兵制,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执行却是事实,否则单纯依赖掳人很难维系一支庞大有力的战斗队伍。

太平天国还准许民众以合法形式约束太平军违纪行为。在许多太平军安民文告中均有准许民众依法抗争的内容,如“业已严禁该兵士等一概不准下乡滋扰,倘有不遵,准尔子民捆送来辕,按法治罪”“不准官兵滋扰以及奸淫焚杀。倘竟有不遵约束之官兵,准尔四民扭送该县,以凭究办”“如有官员兵士以及不法棍徒吓诈生端,许该民人扭赴来营,以凭讯究,决不宽贷”“倘有不法官兵下乡奸淫掳掠、无端焚烧者,准尔民捆送卡员,按依天法,轻则枷杻杖责,重则梟首游营”等。<sup>⑥</sup>在实践中,有的将领对违纪者能做到严惩,对受害民众一般也能做到安抚。当然,准许合法抗争不代表支持和鼓励此类行为。1860年秋,常熟王市田村农夫数人捉住掳劫奸淫的太平军士兵,请乡官捆绑入城问罪,而负责接待的将领却以“新到长毛,不服约束,且言那[哪]一朝不杀人,不放火,使百姓自行躲避”之语敷衍。<sup>⑦</sup>不过,太平天国对民间以合法形式监督和纠正弊端行为持许可态度,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地方行

①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观察到“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曾国藩李鸿章奏为苏松太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中定额等事》,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4846—0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10册,第154页。

③ 《瑛兰坡藏名人尺牘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④ 《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373页。

⑤ 林大椿《粤寇纪事诗》,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6页。

⑥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94、118、144页《忠诚一百六十二天将林彩新饬青岩四民急散团练痛改前非劝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页。

⑦ 汤氏《鞞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321页。

政有向良性统治方式转型的可能。

## (二) 内战的其他主体负有相当责任

战争本身即意味着灾难和伤痛,战争的破坏性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军一身,内战双方均有责任。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内战,应该充分考虑太平军兴的正义性。清王朝吏治腐败,官逼民反,连咸丰帝也惊呼“各州县土匪尽授伪职,乡民率皆从逆”。<sup>①</sup>只要数百万太平军民投身起义的动机具有正义性,太平天国就不能被完全否定。

在明确战争给民众造成伤痛的同时,也应全面分析交战主体各方的作为,如清军、团练、土匪、外国雇佣军等。总体来看,太平军的军纪较清军为优。简又文以“清军暴行实录”为题系统列举了诸多史料。<sup>②</sup>曾国藩认为“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曾氏显然心存包庇,却难得地承认了清军“行军之害民”同样应为战争灾难负责。据留美归国的容闳在太平军中之访察,丹阳的一位秦姓太平军将领认为“自苏至此,运河两旁荒凉之况”的责任有三方“一为张玉良军队退败时所焚烧,一为土匪所抢掠,一则为太平军之自毁。”<sup>③</sup>此说相对公允。1860年春,刑部主事王柏心致函曾国藩,内称因清军军纪败坏导致民众大量投“贼”。<sup>④</sup>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金念劬《避兵十日记》,主要记录太平军到来前夕苏州、昆山等地败兵溃勇的劣迹。金氏自苏州逃难昆山途中没有见到太平军,却几乎无日不受溃兵骚扰。他评述道:

国初扬州有十日记,备载屠戮之惨,令人不忍寓目。予不特未遭戕害,并未亲见逆匪,徒以败兵溃勇为贼前驱,遂至琐尾流离,不堪言状。癸丑在甘泉,乙卯在丰县,皆曾逼近贼氛。然彼时但知贼匪为害,其次则土寇乘机窃发,初不意败兵贻患一至于此。乃不数年而时局一变,以积年豢养御暴之人,一旦尽反而为暴人,皆有急不能避之势。

行李非舟不行,败兵见有舟楫掠取无遗。舟子闻风远遁,近城无一苇可避者。居多财物尽济盗粮,积尸城河为满。我朝二百年深仁厚泽,所为休养生息者悉遭糜烂于其中,是则败兵之罪实浮于贼。予此记不曰“避寇”而曰“避兵”纪实也。<sup>⑤</sup>

金氏“败兵之罪实浮于贼”的观点是结合自身长期观察和切身体验所得,符合实际。当时皖北、豫西百姓中流传着“贼过如篲,兵过如洗”的歌谣。时人有云“然官兵卒不肯歼灭长毛,其作为与长毛大略相等,所至奸淫劫掠,大为民害,且与长毛表里相比合。”<sup>⑥</sup>

此外,还有团练、乡勇和土匪的“害民”之举。他们造成的破坏不比清军少,如桐城百姓对当地团练局恨之入骨,“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sup>⑦</sup>清政府也承认,团练为祸实是“靖乱适所以致乱”。<sup>⑧</sup>至

① 《寄谕和春等著恩赐前赴全椒堵剿并催征钱粮以资军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1411—1566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9页。

④ 江世荣编注《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4页。

⑤ 金念劬《避兵十日记》,《琐言》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⑥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60页。

⑦ 方海云《家园记》,“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记事”抄本,安庆图书馆藏。

⑧ 《寄谕讷尔经额著派员迅缉保定伙党并饬地方官毋得以团练借词科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页。

于土匪,像1853年太平军进军安庆,皖北各地“土匪蜂起,肆行劫抢,千百成群……拒捕杀人,良民惊扰”。<sup>①</sup>太湖地区的“枪船”武装是苏浙地区“团练”的一类特殊类型,因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数千亡命,恃众横行,睚眦杀人,戕官拒捕”,“日则横刀过市,骚扰闾阎,夜则十百成群,四出劫掠,抢孀逼醮,擄人勒赎,恣所欲为”,<sup>②</sup>普通百姓以“枪匪”称之,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均将其定性为“匪”。<sup>③</sup>土匪还常冒用太平军之名为害四方。在常熟,“凡乱世土匪之恶,不可胜言。每有聚众恃强,口造谣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势骇人,叫噪雷动”。<sup>④</sup>“盖贼擄过后,尚有烬余,又经土匪取后,虽至贱之物亦无不尽也。土人恨之,每呼曰短毛”。<sup>⑤</sup>桐乡乌青镇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土棍枪匪皆冒长毛名目,持械吓逐”,结果造成居民惊恐逃避,“溺死、跌死、践踏死、劫杀死者,盈千盈百”。<sup>⑥</sup>在社会失控时期,土匪、盗贼的破坏性极大,浙江黄岩民间就流传着“长毛如篦,土匪如剃”<sup>⑦</sup>的歌谣。

所以太平军的军纪实态具有对立统一的历史面相,如太平天国历史地位之评价,绝对不能偏执一端泛泛而谈;完全褒赞或全盘黑化,均不合历史实际。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之间综合实力悬殊所致。军纪问题是其自身诸多失误和自我削弱过程中的一项要素。

这就不难理解,《江南铁泪图》中的两幅图虽然都是意在控诉太平军军纪之坏,却描绘了不一样的太平军神态、形象。或是作者无心之笔,或是如实刻画,两张图作在其他史料旁证下,给后人留下一个相对真实的太平军形象。一方面,我们应正视太平军有“打先锋”“擄人”和“屠灭”的不良表现,以及给民众带来伤痛、引起民众敌视和反抗的事实。这是使太平天国渐失人心、战局趋于败坏乃至最终败亡的一个要素。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太平军有严明军纪的主观意识和实际行动,才会较长久地维系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坚持斗争数十年,但其军纪实态表现出明显的前后期时间差异、地域差异和主政将领的个体差异。同时,战争的破坏性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军,内战的其他主体亦负有相当责任。总体上看,太平军的军纪优于清军、团练等。在评价太平军军纪时,应看到它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① 《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奏报皖省股众蜂起拟暂驻宿州剿办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第264页。

② 李光霁《劫余杂识》,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11页。

③ 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立即着手剿灭枪船,谕令左宗棠、李鸿章等消灭湖州、苏州“划船土匪”(《清穆宗实录》卷112,同治三年八月癸未,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47册,第491页)。

④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311页。

⑤ 曾含章《避难记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352页。

⑥ 皇甫元培《寇难纪略》排印本,桐乡市图书馆藏,第11—12页。

⑦ 陈钟英等修、王咏霓等纂《黄岩县志》卷38《杂志·变异·土寇始末》,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第27页b。